

1931

年

第

卷

第

5

期

氏年

文一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五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目次

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

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中國革命轉變的前途及任務

論陳獨秀主義

反列寧主義的布哈林

華崗

和森

少林

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

次全會總結的決議

聽了張彪同志關於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報告之後，中央委員會完全一致同意第十一次全會的決議，並責成中央及各級黨部以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和不折不扣性來實現共產國際的決議到實際工作中去。

A、深刻的世界經濟危機。蘇聯的發展，與許多國家內革命危機的成熟：

(一)自從一九三二年年初一直到現在，世界經濟的恐慌，還是在繼續加深與擴大。而在蘇聯，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很大的成功。此種形勢正如國際執委第十一次擴大會所說的「資本主義的穩定已經走到了末路。而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奠定正在完成」(全會決議)深刻的兩個世界的對立是目前國際情勢中最基本的因子。這個對立加緊了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切矛盾與衝突。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日益緊張。中國，印度，安南的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高漲空前的勃發；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和紛爭與楊格計劃的破產，同樣的是在繼續增長，雖然這些矛

用不能夠減輕反而只有增加他們對於蘇聯的共同的敵視和反蘇聯的反革命鬥爭的準備。

在深刻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基礎上，由於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惡化，驚人的失業，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農貧農的破產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革命化的作用。世界革命運動比之一九三〇年二月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有更遠的發展，這主要的表現在：

a 蘇聯已經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b 中國創立了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他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血的鬥爭中逐漸鞏固與壯大起來；

c 在西班牙工人和農民推翻了巴爾龐的專制政府，正在爲着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d 在印度，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離開了並反對着甘地主義而與英帝國主義與印度的地主資產階級作英勇的鬥爭；其他殖民地革命的增長；

e 在德國與波蘭工人階級的鬥爭極端的緊張，走向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底成熟，

f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階級鬥爭和失業運動之更加深刻化；農民運動之崛起與發展，

g 主要各國的共產黨政治與組織影響之擴張；

但是「依照各國危機進展的程度和速度，資本主義內外的衝突的緊張的程度和速度，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高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這次經濟恐慌和戰後資本主

義總的危機四特殊條件密切錯綜的國家中（如德國波蘭）。已經走向革命危機先決條件的成熟。目前，因於經濟危機的深刻化，在西班牙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是很快的在增長，那裏因為封建勢力殘餘的強大，這一過程特別來得深刻」。『在許多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國印度——由於經濟危機與農業危機的交錯，帝國主義與封建高利貸的剝削及羣衆的大量破產，千百萬的羣衆起來作民族的革命爭鬥反對整個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革命危機的因素是很快在成熟』。（全會決議）

（二）在目前的階段上由於經濟危機的深入與革命運動的更進的高漲，資產階級日趨於公開的法西斯蒂的專政。他們按一連二的公佈緊急法令，禁止工人羣衆的集會遊行和最低限度的『人權與自由』，逼迫工人階級的組織走向地底下去，組織不滿的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和流氓份子爲法西斯蒂的武裝團體以進行革命工人及共產黨員的屠殺；但是必須清楚的了解，民主主義和法西斯蒂僅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由掩蔽的財政資本的寡頭專政到公開的法西斯蒂的專政的轉換，絲毫地沒有更換其階級的實質。有時，更可以不變動民主形式的表面，而實行極端法西斯蒂政策。（如白魯寧政府）並且亦不能認爲法西斯蒂的形式已成爲目前資產階級統治的惟一形式。

世界經濟恐慌更加明白的揭露了國際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蒂面目，他的作用是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的主持者，他不僅替公開的法西斯蒂專政開路清道，而且一切的

資產階級進攻工人的步驟都假手於社會民主黨而實現。他們間接和直接的幫助資產階級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削減社會保險費，增加稅捐，實行資本主義合理化，破壞罷工，壓迫殖民地革命運動與屠殺本國的革命工人。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的米勒政府壓迫柏林的五一示威，解散「赤色戰士隊」，頒佈「保護共和國法」鎮壓罷工，而為法西斯蒂專政的白魯甯政府開路。在失去政權之後，並極力擁護白魯甯政府的一切法西斯蒂的進攻工人的步驟。麥克唐納爾因為鎮壓印度革命的勞績，而受到英國資產階級的一致喝采，最後，他更是反蘇聯戰爭中資產階級的一枝尖兵。他們在全世界上為資產階級進攻蘇聯的戰爭的政治的輿論的準備，在蘇聯他們與實業黨及少數黨手攜手去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以為帝國主義反革命干涉的內應。

(三) 兩個世界的對立不能不引導到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積極準備。目前反革命的蘇聯戰爭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的威脅。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順利的執行，使資產階級失了其使蘇聯走上資本主義後蹄道上的最後的幻想；更加上經濟恐慌的劇烈，使他們不得不以侵奪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蘇聯為危機的出路，使世界資產階級不斷的採用武裝進攻和經濟封鎖的政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的增加，蘇聯邊境各國的軍士準備的完成，美國的糧食準備，……一切一切都說明反蘇聯戰爭，已經近在眉睫。目前的事變，更加證明這種估計的正確，胡佛提議的

其實意義，除了企圖挽救德國的革命危機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團結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美國的領導之下，進行反蘇聯的戰爭。萬寶山事件日本的武士道曾公開的宣稱這是對俄必先對華政策之先聲，而且毫不隱蔽的說，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第二次日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樣，帝國主義內部的爭鬪，英美爭取世界霸權法意，英法，德法，美日等等的衝突與矛盾亦日趨緊張，以戰爭來重新分配世界，以挽救資本主義之危機已經變成了各帝國主義列強政府的唯一出路。

B、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危機與工農民主專政的發展。

(一)由於半殖民地的地位與廣大的封建殘餘的存在；世界的經濟危機，推動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到完全潰滅的地步。經濟危機與農業的危機密切的錯綜在一起。在一時期中已經處在長期的停滯與恐慌狀態中的民族工業（絲，紗，烟等）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之下，形成了大批的倒閉與非民族化。民族資本在重工業中的地位，更是逐漸減少，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完全的統治。交通運輸方面，鐵路因為軍閥戰爭的原因而破壞不堪；海運則非但外洋船完全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之中，而且內河船亦不能與外洋船競爭而宣告停班（長江上遊）。另一方面正因為世界經濟的危機，帝國主義者更加緊迫地加緊在華投資。（從今年二月到六月各帝國主義者在華設立的新工廠約七八

百所資本達一萬萬五千萬元）在帝國主義地主高利貸的重重剝削下的農村經濟，正處在空前的浩劫的地步。在原料供給的市場上，中國除了特產品（大豆桐油等）外，幾乎完全地被排擠。因為帝國主義和地主的非人的剝削和長期軍閥戰爭的結果，毀滅了一切灌溉的設備而喪失千百萬農民的生命和災荒，成為經常的現象。去年的西北的大旱及今年普遍十六行省的水災，接着地震撼着世界的聽聞。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官僚們（華洋義賑會賑務委員會等）更藉賑災的名目來進行搜括，高利貸和奴役農民（工賑，貸賑，急賑）。工業的破產與非民族化，帝國主義侵掠的深入，與農村經濟的空前浩劫，這就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圖畫。空前的羣衆失業，工人生活水平線的低降，資本的進攻，農民的破產與餓死，災荒，戰禍，這就是國民黨統治所必然造成的而且已經造成的結果。

（二）世界經濟危機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影響，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根本矛盾更進一步的緊張。羣衆生活的惡化到餓死的水平線上不能不引導到一方面革命運動的繼續增高，在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的蘇聯政權與紅軍的建立，革命危機在全國範圍內的日漸成熟，另一方面，反動統治以全力保全自己的政權，動員一切力量進攻蘇區與嚴厲地厲行白色恐怖。同時，他們更加積極地進行武譟與欺騙的宣傳。在土地革命中湧現出來的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是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中實現

自己的領導權的條件，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政權的形式中實現和加強起來。蘇維埃和紅軍的建立，使中國的階級鬥爭走到了最高的形式——國內戰爭的形式。在國內戰爭中，紅軍正在奪取敵人的武裝而武裝自己。蘇維埃政權亦正在與蔣介石，內部的敵人（A、B團等），及自己的錯誤（立三路線）奮鬥中獲得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初步的豐富經驗。千百萬的暴動起來的中農和貧農，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是不可戰勝的力量。不論紅軍怎樣槍械缺乏和陋敗，不論作戰條件怎樣困難，而第一第二次的圍剿的衝破給了帝國主義者蔣介石陳獨秀羅章龍及黨內的灰心失望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一個良好的教訓。

第三次的圍剿，蔣介石『海軍親征』的結果，在江西線上，除了紅軍為作戰的必要而縮短戰線之外，蔣介石沒有任何的進步，而左翼的朱毛（是蔣介石的兩個將軍，（朱紹良毛炳文）不是紅軍的領袖！）的覆滅，陳誠的潰敗是國民黨的檢查員和帝國主義的報紙所不能隱蔽的事實，在鄂豫皖，湘鄂邊線上，紅軍的發展已屢屢的引起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驚懼。英勇的工農紅軍的戰績，在中國的革命史已經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今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更進的發展，是依據在蘇維埃和紅軍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之上』。

（三）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和封建的割據，中國革命運動的特點，便是發展的不平衡，雖然，全國革命危機一般的成熟起來，但是他的程

度•和•速•度•是•不•一•樣•的•。一方面存在着蘇維埃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地域上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還維持着自己的兇鋒。前者正在發展與壯大而後者則日趨崩潰。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的矛盾與衝突，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國各地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間的鬥爭，說明了爲什麼在對於工農民主專政一致的威脅之前，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與分裂的產生的真實原因。南京和廣東的分裂，北方的軍閥戰爭——反映着國際帝國主義的爭鬥，反映着英美日爭取中國的鬥爭；另一方面，他更是中國統治階級間爲着怎樣能夠更好的挽救自己的統治與消滅蘇區與紅軍的爭鬥。這種分裂和戰爭的本身，便是國民黨統治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更進一步的崩潰的表現。這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日趨緊張，不過他們內部矛盾的增長不但不但能削弱而且只有增加他們與蘇維埃運動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產生軍閥混戰的社會條件與社會基礎沒有被工農革命的浪潮所推倒以前，軍閥戰爭的重演與擴大將永遠地威脅着中國的勞苦羣衆，祇有工農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才能夠消滅軍閥戰爭與從完全的殖民地化與經濟浩劫中挽救中國。

(四)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的加緊，國民黨更進一步的屈服與投降帝國主義，經濟的恐慌和災荒，資本的進攻，羣衆的失業，生活水平線的低落與飢餓，及蘇維埃運動的影響，引導到反動統治區域內的革命更進一步的高漲，這主要的表現在：

a 反帝國主義運動新的怒潮；在工人貧農苦力激烈的反帝情緒面前，上海買辦階級的反日援僑會，只不過是一幅可恥的滑稽畫，這些分子的企圖便是「領導」反帝國主義運動使反帝國主義運動，失去其真正的領導；

b 工人罷工爭鬥的更加緊張化，爭鬥更明顯地暴露其反攻的以及政治的性質；
c 兵變潮流的高漲；

d 農民運動的繼續不斷的爆發；因為水災的關係，在今年秋收爭鬥，黨將處在空前的廣大的農民騷動面前；

e 城市小資產階級對於南京政府的反對態度的增長；

客觀條件對於黨的工作是最順利的。全國的革命風暴漸漸接近了，革命爆發的鎖鑰是在我們黨的手裏，只有黨的積極性的活躍，才能決定革命大爆發的程度和速度。

C、黨的工作的條件與目前的緊急任務。

(一) 在四中全會時，以及四中全會以前；共產國際曾經正確的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放着下面的三位一體的中心任務：

a 創立有工作能力的得到羣衆擁護的蘇維埃政府，來組織與領導蘇區與非蘇區的革命運動；

b 創立強有力的工農成份的政治上絕對是在黨的指導之下的紅軍及鞏固紅軍的根據地。

c 開展工人階級的部份的日常的經濟鬥爭，引導他們到總的政治爭鬥上去；加倍對於反帝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

這些任務中央認為在今天還是中國黨的中心之迫切任務。

(二) 在共產國際直接的幫助之下，四中全會堅決地責譴政治局過去的錯誤路線，指斥了三中全會的調和態度，斷然地肯定，立三路線為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指斥了當時政治局的某幾個同志的對於共產國際的虛偽和兩面派的態度，更新了黨的領導的成份，毫無二語地同意並堅決的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國革命中惟一的正確路線。半年來黨在工作的過程中，在執行國際路線的過程中，黨得到了下面的成績：

a 對於蘇區領導的加緊，造成了蘇維埃和紅軍的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黨和蘇維埃政策的真實的轉變，澈底的平民式的重新分配土地，因而大大的提高羣衆的鬥爭的積極性；在創立真正良好的鐵的紅軍的工作上，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蘇維埃機關的改造，混入蘇維埃機關的富農和階級敵人的肅清。所有這些工作的結果，使我們在蘇區中的力量，更加鞏固。

b 正確的政治領導與兩條戰線上的堅決鬥爭；使右傾機會主義的小團體（羅章龍派）完全地破產；並解除了立三主義的武裝。思想上的鬥爭與某些組織的結論，一方面，保證了一部份被右傾機會主義所欺騙或立三主義者的「左」傾辭句所玄惑的工人同志，回到黨的路線上來，另一方面，黨的和職工會的指導機關中右傾機會主義者與李立三主義者的肅清。這樣使黨有在思想上的布爾塞維克的一致與組織上之穩固。在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上，竟成了重要的一步。

。開始了真實的艱苦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工作與廠內活動，恢復了青年團和工會的組織與加強了他們的領導；提拔了一部份新的幹部作領導工作；改變了李立三時代以及陳獨秀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度委派制度的惡毒的遺傳，開始向布爾塞維克的作風轉換。

(三) 但是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鄭重地指出：在這個時期的工作中的許多嚴重的缺點和弱點。這主要的表現在：

a 第十一次全會所指出的：「落在羣衆的積極化之後」「落後於許多重要的革命運動，失業運動，罷工，與農民運動之後」。「忽略了保護工人羣衆的日常要求，的基礎上動員羣衆爲這些要求而爭鬥，將這些爭鬥與爲無產階級專政的爭鬥聯繫起來」。對於中國黨同樣是正確的。不論在蘇區與非蘇區之中，黨還不能善於

利用和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在反動區域中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依然沒有重大的成功。許多黨部不善於依據工人羣衆的日常要求而動員，而組織他們的鬥爭。在黃色工會中的工作，至今沒有什麼成績。沒有學會把部分的與一般的要求聯繫起來，與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許多自發鬥爭沒有能夠抓住與領導；對於罷工鬥爭的準備常常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對於失業運動的消極是極端不能容許的現象。

b 第十一次全會所指出的：「反對戰爭危險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的鬥爭，其程度並不能到處趕得上帝國主義準備反蘇聯戰爭的程度。反戰爭危險的鼓動，進行得沒有系統，有些地方只是一起一伏的」。這個指斥，對於中國黨亦不是例外。中央嚴重的指出：這時期中對於反對進攻蘇聯的工作非但趕不及國民黨軍閥進攻蘇聯的準備而且有些黨部是忽視了這個任務。特別是審判孟塞維克及實業黨的材料沒有充分地利用向工人羣衆作廣大的鼓動。

c 同樣，對於擁護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工作亦是做得非常的不充分。關於動員到紅軍中去的工作各地黨部都沒有達到預定計劃。甚至將動員工人到紅軍中去的工作，曲解為招募。

d 關於士兵中的工作的積極性亦是非常的不夠，中央的二月決議仍然還是紙上的空文；

e 對於反動區域內的農民工作還是表現有機會主義的消極性；

f 還沒有學會布爾塞維克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聯系，及地下黨與羣衆的聯系，以少數的黨的幹部領導廣大的羣衆爭鬥；

g 許多黨部還沒有學會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與工作檢查；許多「漂亮」的決議，依然成爲紙上空文；與下級黨部的活的領導與聯系，還依舊是不夠；新的幹部的培養與提拔實現得非常遲緩。

h 因爲黨的組織還沒有能夠深入羣衆，因爲多數黨員，還沒有了解地下黨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重要，以致黨的組織與黨的幹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與肉體的摧殘。

i 對於一切反動派別的鬥爭還不夠，未能及時深刻揭穿一切反動武斷的宣傳，（如對於改組派，人權派，第三黨，取消派等）因此這種宣傳時常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一部分黨員羣衆。

j 黨還沒有能夠很具體的教育黨員羣衆怎樣在實際工作中去實行正確的政治路線。

（四）爲着利用良好而順利的客觀環境來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爲着執行中國革命及共產國際在黨面前提出來的三位一體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來執行和完成下面的具體的迫切的工作：

a 最大限度的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區域。 正確地執行一切黨和蘇維埃的法令，澈底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組織和利用羣衆的積極性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而戰。 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堅強紅軍和在最短的時間內創立蘇維埃中央政府。

b 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蘇聯的武裝干涉而戰。 揭破國民黨和帝國主義一切反蘇聯戰爭的準備；真實地動員羣衆爲擁護蘇維埃紅軍，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武裝進攻而戰。 加緊反對軍閥戰爭。 動員重要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到紅軍中去。 廣大的普遍的創立「蘇聯之友」「紅軍之友」等等組織。 擴大在反動區域的工具

c 真實地動員羣衆爲反對資本的進攻而爭鬥；小心地周密地準備每一個工人階級的戰鬥；迅速地使職工會的工作有布爾塞維克的轉變，廣大地發展赤色工會的會員；真正地開始黃色工會中的工作；以奪取工人階級中的最大多數。

d 加緊對於目前正在劇烈開展中的反帝國主義的領導；組織與引導羣衆的反帝情緒的高漲到革命爭鬥的道路上；揭破一切資產階級及改良主義者的假的反帝國主義把戲，這種把戲的真實意義祇是在阻礙勞苦羣衆的民族的與階級自覺。 爲着完成上面的任務必須特別地注意公開可能的利用。

● 各方面的努力的準備對於那必然要來到的今年秋收爭鬥的領導。 蘇維埃運動與災

荒影響之下的農民鬥爭，假如我們有真實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則這些爭鬥將無疑的轉變為土地革命；同樣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工作在目前國內戰爭的環境中有特別的意義，應該加十倍地努力進行。

f 集中力量在大工廠內創立我們的支部；培養與提拔新的工人幹部；廣大地發展黨的組織。

g 根據目前的環境，各地黨部要特別注意從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的組織，嚴密黨的組織，堅決地克服黨內個別的叛變現象，澈底肅清機關主義和一切脫離羣衆工作的以及僱傭勞動的工作方式，消滅對於秘密工作一切忽視，務使今後工作能夠經常的進行。用羣衆的力量來衝破一切白色恐怖與壓迫。

(五) 爲着上面所指出一切的任務的完成：黨必須在兩條戰線的爭鬥上克服一切離開黨的總路線傾向。黨內主要危險，依然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在中國的特殊的條件內，右傾機會主義緊接着公開叛背革命，同時他們更其採用了最可恥最懦怯的機會主義的兩面派的態度。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同時絲毫地不能放鬆「左」傾的李立三路線的殘留，這些殘留還或多或少在各地黨的工作中表現出來。

爲着這些緊急任務的執行，要求全黨同志堅決的起來，對於黨的工作實行澈底的檢閱，在檢閱中盡量發展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評，發展下層黨員羣

衆的積極性，消滅一切國民黨時代翟秋白李立三時代機會主義的殘餘，創造布爾塞維克的工作方法與作用，以完成歷史放在我們黨前面的中心任務！

通知：

因爲地下黨的工作條件與最近的損失與打擊，使中央直到目前纔能夠詳細的討論國際執委的決議。這種遲緩是黨工作上的極大損失。

各級黨部接到此項決議與國際決議後，即應廣大地舉行討論。討論時必須將國際及中央決議更加具體地運用到各該地方去。并將結果報告中央。國際決議與本決議應盡量在黨報上翻印。

中央

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一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之下求解放的鬥爭力量和範圍都增長了。在中國的百萬農民由無產階級指導着建立他們的軍隊，向反革命的國民黨的和帝國主義者的軍隊作英勇的戰爭。中國工農的爲民族獨立，爲土地，爲工農政權而作的英勇鬥爭給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殖民地民族指示出來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之路。

在印度的羣衆們開始了很快地認識，從英國枷鎖下的解放是不能由消極無武力抵抗的叛賣政策的道路，不能由和敵人締條約的道路達到的。工人階級開始了使用羣衆大的罷工的武器，開始了懂得應該與廣大的被剝削的農民羣衆密切聯合建立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萬萬人的戰線。革命的青年和智識份子中已表現出來經常增加着對甘地主義與同「左派」社會改良主義的厭惡，而傾向於真正革命的反對英帝國主義。被壓迫的安南羣衆以無比的力量反對法帝國主義的殘酷白色恐怖而踏上了偉大的反帝國主義戰線的前行。

在埃及，帕勒斯丁納，摩洛哥，敘利亞與愛吉爾，在一切亞刺伯國家中反帝鬥爭的波潮愈漸高揚。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則把得里波里斯（Tripoli）的亞刺伯人成萬地屠殺了，然而暴動者的鬥爭決心他並不能挫折下去。西屬摩洛哥的民衆的革命暴動與其

被西班牙共和黨和社會黨的臨時政府所擊敗不過表示這一亞刺伯區域的鬥爭在開場。

殖民地勞動羣衆在極端的鎮壓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戰鬥。台灣的上層反對日本的壓迫者而暴動了。菲律賓的工人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走向團結，來從美帝國主義枷鎖下作解放鬥爭。荷屬南洋羣島的自由戰士儘管成千地被流放了而反對荷蘭帝國主義，民族解放的游行示威的消息仍不斷地傳來。

在南非洲，馬達加斯加兒，坎亞（Kenya）剛比亞（Gambia）瓜得羅浦（Guadeloupe）洪都拉斯（Honduras）與聖多明果（San Domingo），在法屬與比屬剛果和在尼格拉（Nigeria）黑人羣衆走上了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的道路。特別是在南非洲的運動已達到了黑種和白種工人的有覺悟的階級鬥爭的階段（失業工人遊行，五一，罷工等）。美國的新特別法令對土人的土地加強搶奪，白種奴隸主人施行的加緊壓迫，新的恐怖之潮，私刑殺戮與逮捕并不能把黑種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制度的自由鬥爭阻止。新的絕大的後備軍加入了反帝國主義的戰線。

在拉丁亞美利加（南美洲）工農羣衆對美帝國主義同樣也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正在激烈化。那些由資本家，大地主集團與其將軍們所作的變亂，其目的無非使這一帝國主義來代替另一帝國主義而已。不斷地抬高的羣衆運動却用同樣的鋒銳向金元帝國主義和金鎊帝國主義施重擊。執行委員會祝賀尼加拉瓜（Nicaragua）的英勇戰士；他們

手執武器與美國的強敵對抗已經三年了。中美與南美的鬥爭，對中國的干涉，美國之幫助國民黨子手政府，對黑種人的中古時代野蠻的壓迫，南部諸邦的奴隸般的條件，這些都表明金元帝國主義的強盜的真面目。執行委員會宣佈墨西哥法西斯政府的穢行，作美帝國主義的無恥的工具殘殺羣衆而不恤，執行委員會認爲現在洪都拉斯（大失業運動）與古巴（大罷工）發展的鬥爭是本同盟的反帝解放鬥爭重要的現象。認定在拉丁亞美利加各國家遍處建立同盟的羣衆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并號召起來作新的舉動以擴充反帝鬥爭的羣衆基礎。

在埃及，敘利亞，帕勒斯丁納，在中國，印度，安南，在摩洛哥，非洲與拉丁亞美利加——遍處都是暴動和羣衆運動。民族壓迫的無比的壓力，鬥爭的無比激烈化，使得在主要的殖民地中由被壓迫民族中最強毅勇敢的階級——工人階級一天一天更高地取得了反帝戰綫的領導，擔任了把一切被壓迫民族熔鑄成一個偉大的戰綫。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方法來壓迫逮捕革命的反帝的自由鬥爭。他們嘗試由加緊剝削奴役被壓迫民族來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恐慌。世界經濟恐慌把殖民地國家的勞動羣衆的貧困，災難與剝削無窮地增加了。恐慌，特別農業恐慌在殖民地國家肆虐，其影響已使百千萬人到了絕境，爲任何他處所無有。奴隸勞動和強迫勞動更高度地成了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的組成部份。農民羣衆更多地動作起來，向帝國主義的炮壘和高城

衝打。

殖民地剝削之加緊反而影響到帝國主義國家勞動羣衆的生活狀況，增高他們的貧困。因此而羣衆們更見明白，帝國主義國家勞動者的生活利益是和殖民地民族的利益互相關聯的。被奴役民族的政治的壓迫也同此無窮的剝削而加劇了。每一極小的自由運動，每一建立民族革命機關，組織工農羣衆的輕輕嘗試都引起成千成萬工農學生的逮捕與生理的毀滅。各國的法西斯運動鼓動起好戰的人種仇視，乃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用來撲滅革命羣衆運動，特別也在殖民地的。例如德國的法西斯軍官在蔣介石處供職便是。

正在生長的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憤怒迫使帝國主義者更多地利用宗教的組織來對被剝削羣衆的民族和社會的解放作戰。這在各教門領袖（羅馬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膜罕默德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等等）之反蘇聯的十字軍遠征，在華梯龍（K. H. H. H.）（羅馬教皇）的戰爭政策，在教皇的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通告。在甘地之在印度利用宗教宣傳等等可以見出。這一切與同明年在杜白林（Dublin）愛爾蘭首都）開的。大會聯系起來揭露了宗教領袖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狗的作用。

在對被壓迫民族的戰爭的前線上也立着第二國際。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對印度的自由運動作戰，使飛機轟炸印度的村莊，絞屠印度的革命分子，遣遠征軍去打緬甸

，使揚子江上的英國軍艦轟擊中國的工農紅軍。 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喋血壓迫埃及與亞利伯民族的自由運動，并幫助南非洲的奴隸主人的政治。 凡迪文，第二國際的主席受蔣介石的邀請遊歷中國。 法國的社會黨人擁護法帝國主義在安南，敘利亞，愛吉爾，圖尼斯，摩洛哥，與法屬黑種人殖民地的流血的恥辱行爲。 亞姆斯特坦（改良主義職工國際）的湯麥斯在殖民地組織反對革命工會運動的鬥爭，而擁護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警察工會。 西班牙的社會黨人作反革命的共和黨政府的人員和台柱而幫助喋血壓迫摩洛哥的暴動，與同喀塔羅尼亞（Catalonia）及其他地方的民族運動。 比利時的社會黨人不僅擁護比帝國主義在剛果的恥辱政策，而且藉比國工人銀行去直接參加剝削黑人羣衆。 荷蘭的社會黨人幫助打計劃挽救荷蘭在南洋羣島的統治并且直接參與該處的殖民地管理機關。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擁護新德帝國主義的在國際聯盟裏要求曼達特的企圖，就是要求新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對被壓迫民族的恥辱行爲沒有一次不待第二國際和亞姆斯特坦國際的參加，並在本國的無產階級面前特作擁護。

在這兒那些所謂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却表演着更無聊的角色，麥克斯登，和費門在反帝同盟一九二九年佛朗克府大會上口頭儘管發誓忠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而實際上則叛賣牠。 費門爲國際運輸工會的領袖而不作任何舉動以阻止遣送軍械和軍隊去進攻中

國的蘇維埃。對於荷蘭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一句抗議的話也不講。費門先生從反帝同盟裏逃跑了（自己宣佈退出的）。儘管反帝同盟秘書處要求援助亞刺伯國家的革命暴動，而他才反對暴動而擁護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期洪黨（Zionists）。麥克斯登先生的態度也同樣的。儘管在佛朗克府大會上的一切光冕堂皇的申明，他毫不知恥地擁護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舉動，麥克唐納，伊爾文與鮑爾溫的對印度政策。他擁護帝國主義者及工黨政府在印度，中國，埃及，與其他英國屬地的整個反革命政策，而同時嘗試用激進的空話來網羅英國工人防止他們的革命鬥爭。

反帝同盟作澈底的反對帝國主義擁護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自然不能與這類的人有所共同。因此執行委員會批准英國支部之開除麥克斯登并且把這類的叛徒從隊伍中趕出去。他們的消失只有使反帝同盟加強的。

在大地主，高利貸者，王子，諸侯與貴族之外，帝國主義又有效果地用很小的對於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的本質無損的讓許也來取得民族資產階級作聯盟者向增長不已的民族解放運動作戰。在各國的民族改良主義者由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他們並不代表民族的利益 不向帝國主義的壓迫作鬥爭。他們時常站上革命鬥爭的頭頂上去，其目的只在於這樣更容易把鬮爭折斷。因叛賣民族利益而受償，他們從帝國主義者那裏得到小小的讓許，對於殖民地統治的本質無變改的。反帝同盟警告他的信徒們不要墮入民族

改良主義者所散佈的幻想中，以爲達到民族獨立不用革命鬥爭就可能而在利用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這話之下實際從屬於某一帝國主義集團，由此使得民族運動替這一帝國主義集團効勞。對民族革命運動最殘酷的流血恐怖，給叛徒——叛賣反帝鬥爭的——以小的讓許和預約，這就是目前帝國主義政策的本質。和印度的民族會議和中國國民黨，在帕勒斯丁納和亞刺伯執行委員會，在敘利亞和苦得爾華唐，在埃及和華甫得在南洋羣島和沙累喀伊斯拿姆大辦其交涉。反帝同盟警告勞動羣衆不要相信帝國主義者這些把戲，并號召他們起來對這些把戲鬥爭。號召起來揭露民族改良主義者之參加這種生意買賣。

反帝國主義鬭爭的激烈化很明瞭地把民族改良主義黨的領袖們的反革命作用揭露了。印度的民族會議（或稱國民會議請按經常使用者爲準 *Nationalkongressen*）爲無足輕重的讓許而公開地把印度的民族獨立完全出賣了，這給了一個特別重要的教訓。民族會議的執委贊成了英國副王與甘地締結的叛賣條約。因此遂成了英帝國主義，印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走狗，成了他們口頭上那般神聖的印度獨立的叛徒。

在這裏那些所謂左派民族主義者如耶華哈拉勒魯與博涉表演着更可憐的角色。勒魯以反帝同盟執行委員的資格光冕堂皇地負下澈底革命反帝鬥爭的義務，却證實爲甘地的副官了，他用左的激進的空話來幫助施行甘地的叛賣政策。勒魯與博涉嘗試過了而

且還正嘗試着最無恥地欺騙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羣衆。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更認定，蘇巴斯博涉，魯易，幹得喀等人也走上了這條路而放棄了印度自由的事業。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認定勒魯是印度民族從英國枷鎖下解放事業的叛徒了。在印度的廣大勞動民衆面前最尖刻地揭露勒魯之加入了反革命營壘而把他開除出同盟的隊伍去。執行委員會同時又警告印度的民族自由戰士們提防那已成了英帝國主義走狗的耶華哈拉納魯，博涉，魯易及其他左派民族主義者的一定要動手的欺騙眩惑的把戲。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號召印度民族會議的羣衆們和他們的叛徒領袖們斷絕，超過他們的頭而去消滅那和英國結的恥辱條約，使用一切力量來組織爲印度完全獨立的鬥爭。反帝同盟以求完全獨立的革命鬥爭來和麥克唐納甘地的帝國立憲這民衆欺騙相對立。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號召印度的真正要求獨立的戰士直接來加入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同時紀念那被英帝國主義屠殺了的印度革命者巴卡特醒等人，他們是爲印度的自由鬥爭的事業而死的。凡是表同情於這些勇敢的被屠殺的革命者的人都應該加入革命戰線以促進鬥爭的勝利。這個鬥爭是不能夠由英雄式的個人行動成功的，而只能由有覺悟的有目標的工農和革命青年的羣衆行動。

反帝同盟祝賀南洋羣島的同志們，以自動的積極來反對那實行了投降政策的哈達。

以同樣的程度如帝國主義者之加強了他們之向被壓迫民族進攻，也同時加倍了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大舉干涉蘇聯的準備。他們在那裏嘗試，由被壓迫民族的勞苦羣衆中成立軍隊以襲擊那唯一的實現了民族自由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無疑地帝國主義者在當前的進攻蘇聯時要使用被壓迫民族的百萬勞動者去作反對工人國家的炮灰。

蘇聯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發展與民族自由的國家。五年計劃的無比的進步，迅速成就的社會主義建設對於一切在蘇聯裏結合的民族是一個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偉大進步。蘇聯的例子指示出來，根據着革命解放了的各民族的團結主義，先進的民族怎樣地兄弟似的扶助落後民族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叫一切附屬的各支部與各個人盡義務用一切力量來組織擁護蘇聯的鬥爭，來揭露帝國主義者的有系統的誣蔑挑唆手段，而告訴羣衆，這些反蘇聯的戰爭準備，是將要把殖民地勞動者送給這反動的戰爭作炮灰的。反蘇聯的干涉戰爭同時也就是反殖民地民族自由鬥爭的戰爭。同盟特別指摘那講蘇聯強迫勞動的仇敵誣蔑，作這個誣蔑的人，就是自己在殖民地用盡一切方法來擁護強迫勞動和奴隸制度的人。

同時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教一切正直反帝的戰士注意，一切帝國主義者，特別美英法日帝國主義不僅金錢，軍火，遣送軍事顧問——德帝國主義參加最多的——不僅由供給反革命軍隊以戰具來幫助那反對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反動戰爭，並且用自己的軍隊與軍

繼續進行了對中國工農革命的公開的反革命干涉戰爭。起一切的力量。

二六

擁護中國革命需要反帝戰線中提

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滿意地認定，單獨幾個領袖之懦弱遁逃與無恥叛變並未絲毫把反帝鬥爭削弱，恰相反地把他加強了，在營壘中有得到了更多的明瞭和堅決果斷。這鬥爭是走進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了，一切矛盾的激烈化，局勢的嚴重使反帝同盟義不容辭地也加強他的鬥爭，鞏固他的組織。一切份子，凡是志願正直地爲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獨立而鬥爭的，不因恐懼勞動羣衆的社會要求而背離自由戰爭的營壘的，都應該在一個戰線裏團結起來。

反帝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會的各種決議案是同盟的營壘的指南。根據這些決議案同盟是並且保持其爲一個超黨的，包括一切革命的自由戰士的組織。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抬高起來民族解放運動是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羣衆的鬥爭最緊密關聯着的，並且大聲申說蘇聯是真正革命反帝鬥爭的高城。他認定單個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同盟支部總還未曾發展出一種和任務的偉大相當的積極性。殖民地國家一切革命力量的組織與結合，獲取革命工農羣衆道路線的繼續，仍保持爲反帝同盟的主要任務之一。

同盟執行委員會認定國際秘書處在佛郎克府大會以來時間中持有正確的路線，并在

大會決議案的意義上對於殖民地的重大事變採取正確的立場。牠爲單個的重要地方，特別爲英國，法國，比國，西部與南部非洲打造了組織工作的切實計劃。然而國際秘書處的工作和組織中的應當剷除的缺點仍必要以公開的批評認定出來。和各殖民地的直接聯絡不足。關於亞刺伯暴動與印度事變秘書處固然起了發動作用，而在好些別的事變例如最後的援救默魯獄中戰士，却落在運動之後了。也就那些發啓得好的舉動在多數國家中都祇在初期進行得好，隨後就常常過早地怠慢下來，並且不見有組織上的結果。在將來應該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和殖民地中作更多的活動的羣衆工作。再者對於中國與安南的恐怖沒足夠地組織抗議舉動。還沒有出刊國際的雜誌，并且一般地很少反帝的刊物這事實也應歸爲國際秘書處工作的缺點。他的工作在這種範圍的實現却要一切支部也認真地動手擴張他們的組織活潑他們的工作才可能。執行委員會不得不認定，在這一觀點上除英國相當成功（最近全國會議良好的進行）的例外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儘管國際秘書處的勸告而僅有極小的組織上的進步。特別要指出來的是法國支部的消極性。執行委員會希望各支部從此幹起來克服他們的組織上的弱點。

定期在六月底國際反帝徵求週，各處都應該在這種意義上利用。在還沒有反帝組織的國家中（比國，捷克等）應開始建立他。反帝同盟應該成爲殖民地，歐洲的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一切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鬥爭聯合。并由他的各支部與參加的各

組織去發動吸引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羣衆到反帝戰線的積極鬥爭裏來。

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認定在這反帝鬥爭的新的較高的階段中下列的綱領的要求應作他行動的總路線：

- (一) 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完全民族獨立；
- (二) 被壓迫民族的完全自決權；
- (三) 撤送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中的駐軍；
- (四) 一切民族革命的組織，特別革命的工農組織完全自由；
- (五)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銀行、礦山，大農場，土地等歸爲國有，否認對帝國主義者的債務，取消一切賠款支付；
- (六) 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與勞動農民

只有誰承認這些要求而爲之鬥爭才能被認爲實在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的戰士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付託秘書處以下列任務：

- (一) 根據上面的幾點製造一個綱領拿到各支部中去討論。
- (二) 眼覓着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總大意義把這些被壓迫民族和少數民族有系統地聯合起來，而集他們在同盟周圍或使其加入，並在執行委員會的機關中給與相當的代

表圖。

(三) 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代表應該更多地吸引來參加執行委員會機關的工作與代表團。

(四) 秘書處應該盡一切必須的步驟，以出刊一種雜誌，來把反帝同盟的綱領和口號通俗化，傳達到羣衆中去，並成爲思想上政治上反帝鬥爭的聚合點。

(五) 各支部，特別帝國主義國家的應使積極化，特別注意在各國中建立領導份子和活動隊，以作爲羣衆間的聯系。

(六) 秘書處受委託，由於團合殖民地國家一切革命的工農組織與民族革命組織來加強反帝同盟。

(七) 秘書處受委託，特別對近東，在非洲的黑人區域，在拉丁亞美利加的反帝組織加重注意。

(八) 秘書處應留心使執行委員會的會員本人更多的親自參加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帝鬥爭之組織與宣傳。

(九) 還有一個重要工作是青年工作的繼續建立，國際青年秘書處工作之加強與各國青年支部之建立。

(完)

中國革命轉變的前途和任務

三〇

華 崗

一 引言

中國資產階級地主的聯盟沒有解決引起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革命的矛盾，他亦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恰恰相反，國民黨幾年來的反動統治，只有使這些矛盾更加深入更加劇烈。這些矛盾現在正在擴大的基礎之上重複產生出來，它用着歷史上不可延緩的力量預先規定着那新的更加深刻的革命浪潮的高漲。雖然目前的形勢，暫時我們依然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依然還沒有匯合起來。可是無疑的，土地革命受着無產階級的領導，將要更加發展，而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全國高漲，而且事實上現在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新的新高漲，已經為成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和托陳取消派與羅章龍等右傾機會主義投降派的預言，完全相反。

中國目前形勢的具體特點，正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更加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尤其是帝國主義強盜進攻蘇聯壓榨殖民地更加兇暴及世界革命進一步高漲的國際背景之下；在國內經濟政治危機繼續增高，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統治分裂崩潰更加急劇的條件之下，開展着更殘酷的國內戰爭。

一方面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分崩離析，新的軍閥混戰表現日益緊張的形勢，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却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爲圖維持他們自己的剝削統治拚命的進攻紅軍與蘇區，實行熱情的反革命的屠殺和戰爭，這樣使中國共產黨要更積極更緊張的領導廣大工農勞苦羣衆與工農紅軍，在澈底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

這種情形使我們要更積極的提出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的道路和任務的問題。因爲「只有在中國革命發展前途的不可避免的觀點之上，才能夠設想現時鬥爭的進程，而正確的規定黨的現時任務和策略」（一九三〇年七月共產國際執委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另一方面，自從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半托洛斯基主義實質和他對許多別的基本問題一樣暴露破產之後，黨內一般的都還缺乏對於革命轉變問題正確的了解，雖然有一部分同志對此問題的興趣已經逐漸提高起來，這就使我們積極提出這一問題并給以相當的解答更成爲必要。

二 爲什麼有革命的轉變？

首先要我們解答的問題，就是爲什麼有革命的轉變？ 革命轉變的理論和實際建

樂在什麼基礎上？

我們每一個同志一定都懂得：我們國際無產階級所力圖實現的最終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世界系統代替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過了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的準備，牠是人類唯一的出路。只有牠能夠排除資本主義系統的根本矛盾，把人類從腐化和沉淪中挽救出來。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懂得：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定律。此種不平衡規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深刻，更形厲害。因此我們決不能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看作同時並起，一舉而成的動作。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並不是同時並起一氣就成功的，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一下子就同時建立起來的，它是要由多種時間不同性質不同的過程匯合而成的；如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往前轉成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爭，殖民地革命等等。祇在終結的革命過程才進到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重。此種不平衡引起資本主義形式之不同，引起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程度的不同，更引起革命過程的各種不同條件和特殊條件。這些情形，使無產階級之獲得政權，在歷史上必然採取各種不同的路線和速度，使有些國家在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去時，必經過某種過渡階段，並且更使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也各不相同。

築在什麼基礎上？

我們每一個同志一定都懂得：我們國際無產階級所力圖實現的最終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世界系統代替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過了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的準備，牠是人類唯一的出路。只有牠能夠排除資本主義系統的根本矛盾，把人類從腐化和沉淪中挽救出來。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懂得：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定律。此種不平衡規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深刻，更形厲害。因此我們決不能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看作同時並起，一舉而成的動作。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並不是同時並起一舉就成功的，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一下子就同時建立起來的，它是要由多種時間不同性質不同的過程匯合而成的；如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往前轉成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爭，殖民地革命等等。祇在終結的革命過程才進到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重。此種不平衡引起資本主義形式之不同，引起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程度的不同，更引起革命過程的各種不同條件和特殊條件。這些情形，使無產階級之獲得政權，在歷史上必然採取各種不同的路線和速度，使有些國家在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去時，必然經過某種過渡階段，並且更使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也各不相同。

譬如說，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等，因為有着強大的生產力，高度集中的生產，意義較小的經濟，及成立已久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在這種國家裏，政治方面的基本綱領要求，是直接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經濟方面的主要要求則為：沒收全部大生產，建設巨大國家蘇維埃農莊，以數量較少的土地已給農民，自目的市場關係的範圍較小，一般社會主義發展的速度，尤其是農民經濟集體化的速度極快。因此在這種國家裏，根本沒有「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過程。

另有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如日本及西班牙葡萄牙波蘭等類國家中，它們在農村經濟上顯明地尚有許多半封建關係的殘餘，有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物質先決條件，更有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但是這種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不必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別階段來完成它，而可以由無產階級革命來把它完成，把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附帶任務。這裏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底區別是很大的，這些國家裏掃除半封建關係的許多殘餘的必須性，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上面烙着特殊的記號，但是那些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之下的革命過程，無論在過去或將來都不會有的，如像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那些國家一樣。

但是在別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如巴爾幹半島諸國等類國家中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國及附庸國如阿根廷巴西等類國家的革命道路却是另一種形式。因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家中，其工業發展尚在萌芽時代，有時工業發展雖達可觀的程度，但大多數還不敷獨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中世紀式封建關係或「亞洲式生產方法」的關係，在有些國家的經濟及政治上層建築中，均佔優勢；最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國家的主要工業商業銀行等企業及主要交通工具，大田莊，種植場等等，均操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掌握中。在這些國家裏，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一方面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資本主義前剝削形式等的鬥爭，和徹底實行農民土地革命，他方面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的鬥爭。通例，這些國家只有經過許多準備階段，只有經過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時期以後，方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而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則大多只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直接幫助的條件之下，方有可能。

同時在別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也要經過從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不過這種「轉變過程」比之於像我們中國等還沒有達到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程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要快些。這裏的區別也是很大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上與在保存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區別，但是他們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間的互相關係，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雖然要克服的困難有不

同的程度，革命轉變的過程也有不同的速度，但是他們都要經過革命轉變過程的實質，無疑是相同的。

所以共產國際綱領中，說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形式』時，同時也就說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把他們分爲轉變到或不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兩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主要的差別，歸結到從前列寧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通常的』與『非通常的』形式，因爲在列寧看來，非通常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有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的革命。

三 中國革命目前的性質與前途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都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目前中國革命階段仍舊保存着以前的任務：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取消地主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聯盟，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所有這些任務就規定中國的革命當前階段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

然而中國革命和普遍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同，首先從革命動力的成分上可以看出他的區別。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外國帝國主義及封建地主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在

中國大革命的初期曾經推動民族資產階級採用革命的步驟，但是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再加上中國土地制度的特點與土地革命的開展，就使民族資產階級很快失去他自己的革命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已脫離革命戰線而投入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因此中國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同着資產階級，自然更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却要直接反對資產階級，而去執行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的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特殊性，還在於：他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中國社會的實質規定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同時中國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同時也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却在準備着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裏，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亦就是中國革命經過許多過渡階段，而逐漸徹底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的經濟的基礎。

所以「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存在，就是中國革命民權獨裁的特點。中國革命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過渡階段；然而中國革命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縮短得很多，與俄國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看得出的速度比較起來，中國革命從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要快得多」（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七月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四 中國革命轉變的內部條件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僅有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之歷史的可能，而且有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前面站着一個絕對的問題：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隸化，而羣衆更加破產；或者是蘇維埃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事實上中國工業農業的危機，使經濟上需要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過渡性質的辦法。而且中國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實行殘酷的鬥爭，并且要和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實行殘酷的鬥爭。中國的民族獨裁，將要有澈底沒收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企業的必要，將要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這就是說：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先，便已經要奪取工廠與製造廠，因為我們的政權。雖然當他還是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專政，但是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才能存在，我們不僅要打倒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豪紳地主的統治，并且還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政權，資產階級因此將要遁逃，資本家將因此怠工，工廠企業將要因此停工歇業，工農政權將因此不得已而佔領他們。不僅如此，將來民權革命澈底勝利時，驅逐帝國主義，推倒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統治，將要進行更殘酷的革命戰爭，數人武裝的抵抗與經濟的封鎖，比現在紅軍蘇區還只佔有小城市及農村的情形一定要更殘暴海辣，那時候一方面掀動更廣大的工農羣衆起來實行鬥爭，另一方面也就勢必使工農

蘇維埃政府不得不由沒收外國企業銀行進而沒收本國資本家的一切大企業去組織指揮全國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就農業來說，中國農業生產力是很低弱的，又遇着空前擴大的災荒，當土地革命澈底勝利，可以從此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時，必然就要遇到一個極大的障礙，這障礙就是帝國主義與國內被革命打擊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富農的頑抗。或者企圖用新的剝削方法，來壓制剛從半農奴制解放發展的小農經濟，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到那時候，一定迫使最多數的基本農民羣衆——貧農中農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戰勝中國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呢？彼時所能得到的答覆一定是趕快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即消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代以有組織的在國有城市工業統率之下的農村集體經濟，到了這樣轉變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了。

再則，中國的情形，可以預料在革命政府之中共產黨要佔多數。因此，無產階級不但對於農民能夠實現思想上的領導，而且能夠實現國家組織上的領導。所以一般的說來，國內社會的前提總算是相當有利的，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的結合，在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最初幾個時期，就已經開始形成起來，這種情形對於中國革命向前開展的速度和形式，自然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因為實行反對中國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農民的主要羣衆將要受革命進

程的推動，而來贊助那些反對外國和中國資本的過渡性質的必要革命政策。

五 中國革命轉變的外部條件

中國的工農革命民權獨裁，比較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決定的民權獨裁，將要有很大的不同，這裏的分別，首先就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現在已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的存在，他正在順利的發展着社會主義的建設。資本主義制度深刻恐慌的基本表現，即為世界經濟分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件事。所以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它在無產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中的影響及權威的發展，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續，增強與擴大。世界無產階級在有了蘇聯之後，才得到了他們的真正祖國，對於殖民地的運動，它變成了最大引力的中心。所以蘇聯是資本主義總的恐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不但是因為牠脫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造成了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基礎，而且還因為它一般的具有絕頂重大的革命作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推動者，起了推動全世界無產者奪取政權的作用。這樣，世界革命的進程，推動宗主國工人，作征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並且更推動數萬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作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有社會主義的中心，蘇維埃共和國及其蒸蒸日上之經濟力量之發展，

就使中國革命將更有力的完成土地革命與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羈絆，並且在經濟上可以與世界社會主義工業中心相接近而逐漸與之聯合，不但可以比較順利的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且有得到迅速發展經濟與文化的可能。

同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內亦有比較順利的環境以幫助中國革命的轉變。我們知道：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是發生於世界革命比較消沉的時期中，但是現在中國新的革命高漲的國際環境不相同了。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危機繼續增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日益緊張，世界革命運動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有些國家如德國西班牙等且已走向革命危機的成熟，這樣中國革命有無產階級專政祖國及一般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之助，而取得革命轉變的順利的國際條件。

六 中國革命將來轉變的形式

由於上面所述這些歷史條件，所以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的開始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便要成爲這一轉變的起重機，也就是這一轉變的基本條件與形式。

中國革命目前直接的任務是要推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民主專政。因爲中國革命只有在工農蘇維埃革命民主專政，才能得到真正的勝

利。『幾個月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所成就的，比政治上停滯的平和的遲鈍的幾十年所成就的還要多』（列甯）。但亦正如列甯所指示我們的，這種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天下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的過去與將來，它的過去是與專制政體，農奴制度，君主特權作鬥爭，它的將來乃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鬥爭，僱用工人對於工人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

從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轉變到社會主義經濟的最必需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必須經過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過程。在為無產階級專政為改造社會制度而爭鬥的過程中，必須組織工農的聯合，以及反對地主與資本家的聯合，這種工農的聯合，是處在工人階級的思想及政治上的領導之下，而為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蘇維埃政權的形式，直接從勞苦羣衆的廣大運動中產生出來，祇有它才能保障勞苦羣衆的最大的積極性，因之也就最能保障最後的勝利。蘇維埃政權乃是最高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它與國民黨的所謂民權主義絕不相同，因為國民黨的所謂民權主義，不過是地主資本家專政的遮掩形式，蘇維埃政權形式與歐美資產階級國會主義的共和國之間亦有天淵之別，何況現在因為危機的深入，所謂歐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差不多都已轉變為公開的法西斯蒂的專政，國會主義已經急劇崩潰，資產階級國家已經加速度的法西斯

斯蒂化，所以胡適新月派的主張與國民黨同樣反動。

蘇維埃政權則不同，它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公開承認其任務是爲極大多數人民謀利益，壓迫剝削者。它將無情的剝奪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在特別歷史條件之下，他爲黨因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起見，可以給無產階級以許多暫時的特別權利，使之比較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處更優益的地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羣衆組織羣衆的最好形式，它在實際上吸收最廣大的工人階級，農民及其他勞苦羣衆來參加革命鬥爭及參加管理國家的事業。它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依靠着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他在勞苦羣衆中實行廣大的德莫克拉西，他比任何其他政權形式，都更親密地接近羣衆。改選代表之權，撤回代表之權，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合併，不按區域而按生產原則（工廠，作坊，農村等等）舉行的選舉——這些都是保證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勞苦羣衆，能夠有系統地不斷地積極地參加一切公共事業（經濟的，一般政治的，軍事，文化的），因之，蘇維埃的德莫克拉西，乃是無產階級的德莫克拉西，農民及一般勞苦羣衆的德莫克拉西，反對剝削者的德莫克拉西。

所以，以蘇維埃爲國家政權形式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就可以成爲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發點。至於這一轉變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將要採取怎樣的態度，那只有爭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才能決定，只有城市無產階級的和鄉村無產階級以及

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團結力，組織力才能決定。

七 革命轉變與過渡時期的鬥爭任務

中國革命在目前發展的階段上，當然還並不剝奪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對於農業，在消滅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後，消滅軍閥制度高利貸剝削之後，資本主義一定要表現向前生長的趨勢。中國革命經濟上的非資本主義性，並不在於立刻便會排斥一切社會關係裏的資本主義，而在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利用爭得的經濟地位，將要造成那種前提和優勢，去澈底發展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這兩個傾向的鬥爭裏，無產階級的勝利不但要由國內的條件來決定，而且要由國外的條件來決定。共產國際已經明顯指示我們：社會主義是不能一下子直接實現的，過渡到社會主義要經過許多階段。進到社會主義的各個步驟，應當從羣衆的需要出發，應當要使大多數的人民認識這些步驟的必要。這些步驟應當是經濟實際情形裏面已經成熟的，應當是經濟上完全可以實行的。立三路線主張現在蘇區就要建立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完全由於他那「中國革命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的半托洛斯基理論出發的觀點，實際更是用「左傾」的空談來遮蓋他那「聯合富農」「反對平均分配土地」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立三主義有根本不認識在中國這一類的國家裏面，因

爲經濟狀況的原故，由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應當要經過好些過渡的階段。中國是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國家，這些過渡辦法應當和農民主要羣衆的利益聯系起來。應當估計到各區域社會情形的區別，估計到農民羣衆的組織力量和覺悟程度的不同，估計到民族祠堂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影響的力量，應當記得：我們的任務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農的經濟。所以規定過渡辦法的時候，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應當脫離自己農民後備軍。

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在中國情形之下，由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鄉村中底階級鬥爭必然要愈趨劇烈起來。我們爲鎮壓鄉村資產階級起見，只有將鄉村中的貧農，鄉村中那些與工人階級最接近的一部分——鄉村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黨在鄉村中的基本組織任務是：組織雇農，苦力工會及貧農團。在這一原則之下，必須把貧農與中農聯合起來，以對付反革命派及富農等阻礙土地革命發展的企圖。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什麼情形之下——在民權主義的土地改造之中，黨就應該認定自己的任務，是不動搖的力求農村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組織，向他們解釋：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調和的，並且要向他們警告：小農經濟制度的增大，在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之下，永遠是不能消滅羣衆的貧窮的；最後，還要指明：必須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才是消滅一切貧窮和一切剝削的唯一方法。

共產國際又指示我們：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步驟，可以大致的一般規定出來，這些步驟要在經濟上是完全可以實行的，並且能夠保障那些造成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前提。這些步驟之中可以有以下的辦法：外國資本的工廠企業，銀行；新秋加，股份公司，鐵路，大的航路，航空事業，汽車交通，首先是屬於外國資本的都收歸國有；在目前，只有當外國工廠能履行下面的條件的時候，才能允許他們繼續生產。即：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承認並實行社會勞動法，承認工廠委員會。外國的企業家對於這些條件如果破壞一個，無論是怠工生產，關閉企業，干涉蘇維埃政府的內政，或幫助反革命等，蘇維埃政府均應立刻沒收牠收歸國有。對於反對工農蘇維埃運動而組織反革命戰爭的中國資產階級，爲着經濟上解除他們的武裝起見，同樣要把他們的企業和資本收歸國有；對於其他的小的企業則實行監督。並且要實行澈底的合作社化，從消費合作社販賣合作社的最簡單的形式做起；然後實行集體農場化，完全根據於農民自願的原則，並且可以得着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技術上的幫助，建立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去實行繼續加強中國的經濟命脈。

關於土地政策則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平分土地是最堅決的最澈底的肅清土地上的封建殘餘的方法，肅清一切地主的私有制的遺跡，肅清一切富農與農民羣衆間所造成的壓榨關係。平分土地還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法，而是最激進的民權的解決土地革命底任

務，堅決的改善貧農的生活。佃農與中農在平分土地時，即使比以前使用土地的數量減少，也是很有利的；因為革命把他們從壓榨式的佃租之下解放出來了。私有者的中農，在平分土地時，也是有利的，因為革命把他們從壓榨式的苛捐雜稅中解放出來了。

同時，平分土地將領導主要的農民羣衆走向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中國共產黨主張將一切土地與水利收歸國有，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之下，在工農民權的革命專政的條件之下，一切土地和水利收歸國有，這不但是最澈底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手段，而且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初步，是農村經濟進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宣傳一切土地與水利收歸國有，組織貧農，團結主要的農民羣衆在土地水利國有底要求周圍。實現土地和水利國有的權利，要由蘇維埃政府的鞏固，革命在國內許多決定勝負的區域裏面得到勝利，以及主要農民羣衆對於這個要求的擁護來決定。

最後，我們提出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以及宣傳社會主義的前途，同時必須指出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和國民黨孫中山主義的烏托邦根本不同，孫中山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看孫中山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中山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同樣同第三黨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的乾叫亦無絲毫相同之處，第三黨根本就是農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的一部分，他們不過以在野派或半在野派的地位

，從另一方面去挽救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統治而已。再則，我們提出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並不像托陳取消派似的認為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的。正是托洛斯基，他在認為中國革命現在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左傾」空談之後，暗藏着完全忽視現在發展着的農民羣衆的特點。對於托陳取消派，這是很大的特點：他們對於農民的力量和革命到來的估量不足，對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的任務和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本身，正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的形式裏發展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學說，和托洛斯基說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空談，絕對不能相容。托陳取消派這種空談，不過是一種假面具，用來遮蓋他們那孟色維克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的「國民會議」的實際口號。至於立三主義所謂「中國革命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的妄談，亦祇不過是一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現形而已。和上列各派反動思想作無情的鬥爭，亦就是保障中國革命轉變的任務之一。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稿

論陳獨秀主義

四八

利森

一

陳獨秀主義是什麼？是中國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和孟塞維克路線之典型的代表。所有從中國近時革命運動中發生出來的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自威季陶主義，彭述之主義，譚平山主義，以至鮑羅庭主義，都可以且應該歸納在這——中國孟塞維克的總路線之中——即陳獨秀主義之中。

陳獨秀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着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國共產黨表面來影響中國工人運動，原來是很明顯的。他是歐戰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唱者，美國式的「科學」和「民主主義」（新青年雜誌的兩個主要口號）的宣傳者；哲學上，他是從美國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進到法國啓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這恰好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歐洲大戰時期中發展起來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這一時期的表演，在「五四」時期確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憑靠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的「五四」反日運動，漸漸的軟弱下來，而由此運動所引起的北方工人運動（主要是京漢路工和唐山礦工）和上海以及廣東的罷工鬥爭

繼續不斷的表現出新的社會階級帶着偉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於是陳獨秀首先起來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說：「工人的力量比我們大些」。此時正當他們對於「五四」運動的前途發生悲觀，對於「五四」以後的發展方向發生徬徨，他們的先進分子正想「從下等社會」中找出自己的力量和憑藉，這就不得不使他們看中「時髦的工人運動」。因此陳獨秀同着他所影響的急進的智識分子就開始與胡適之派（新青年雜誌中的左翼）分化，改變自己的方向：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方向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俄國方向；由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改向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召集的）。由此，陳獨秀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二

陳獨秀主義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發展經過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大約可分爲四個時期：一九二三年黨的三次大會之前後建立了他的孟塞維克的路線之一般的理論基礎；一九二六年三月事變前後以至武漢時期建立了他的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武漢失敗至六次大會時，是他的動搖和消沉時期，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後，進到公開的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總路線，由取消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之叛逆的社會民主黨地位。

首先看他在黨的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的孟塞維克路線之理論的基礎。這一時期有他最典型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這兩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論的立場和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陳獨秀看重過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他就跑到孟塞維克的根本立場——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勢力。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來說，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展，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界分為三類：（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宗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并未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工人階級的思想尤其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

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

第三，真有階級覺悟并且感覺有組

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的階級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鬥爭之需要，都不會感覺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數（『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固然中國工人階級不是沒有缺點的，可是陳獨秀經常的樂於從缺點方面來看中國工人階級。他在三次大會的演說中，簡直把中國工人階級咒罵得不成東西。什麼『宗法思想』呵！『不脫神權帝王迷信』呵！沒有『國家覺悟』呵！他舉了許許多多的瑣細事實來形容中國工人階級之『窮極醜陋』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會閉幕後寫的，語句口氣已經比在大會爭論時客氣萬倍了。他在大會中從中國工人階級的落後，神權帝王迷信及沒有國家覺悟的立場發出來的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拚命的肯定中國工人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之後，他就很驕傲的誇大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同上文）。又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此文是大會前二星期寫的）。他在大會的答辯中，熱烈地辯護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人。

他對於農民怎樣呢？大會中的左翼會提出工人階級與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理論與他對抗，這在他看來簡直不值一笑，因為中國農民更是宗法觀念、反動思想、神權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大會閉會後，在他的論文中很客氣的這樣說：「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衆革命。但是，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勢力的計算中始終沒有農民，因為他看定了三個原因，農民難於加入革命。試看他所計劃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中國的經濟狀況，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頹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尙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當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的敵對的軍閥階級……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當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時候，陳獨秀是把農民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外，並自始至終了解這聯合戰線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聯合，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合作和階級妥協，在這革命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是居領導地位，而無產階級是附屬的。

陳獨秀怎樣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呢？他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

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固然在黨的六次大會以前，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全黨都沒有明確的觀念，然而如像陳獨秀始終不認識土地革命爲中國革命之主要內容，始終不認識而且不願認識工農民主獨裁制，這對於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說：「在普通形式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算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階級爲什麼目的要加入這革命呢？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則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

工人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就僅僅在這裏——不是爲得爭取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領導權，不是爲得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勝利，更不在爭得革命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種轉變的觀念在他是完全沒有的。他同俄國的少數派一樣，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劃分爲兩個不相連續的階段，即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民

網革命，工人階級只有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對於農民運動也就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說：

「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從以上所述，就可明顯的看出陳獨秀主義在第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之理論的基礎，——即中國革命的工人運動中之少數派的路線；他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而忽視農民；對於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了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妥協，無產階級隸屬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對於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觀念——看不見土地革命的內量，看不見工農民主獨裁而更沒有看見革命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資產階級的獲得政權」，待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將來再來社會革命。所有這些就確確實實形成了中國少數派的總路線。從他的「造國論」以至「汪陳宣言」以至中東路事變後的三封信，不過把這總路線「一言以貫之」吧了！

爲什麼使他這樣呢？這不是偶然的，因爲他自始至終是站在左翼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影響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既然自始至終是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

不能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的領導；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不能了解工農民主獨裁，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造國論之精神）；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必然要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之上，或完全跳過此階段。

陳獨秀在三次大會的立場既然如此，他當時發出些什麼具體的口號呢？「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等待和國民黨分家後，再組織共產黨不遲！」……

三次大會閉會後，陳獨秀和馬林共同提議響應上海資產階級的民治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辦法是請求國民黨發宣言，而不用共產黨名義發宣言。當時，我向他們抗議，才把這一個企圖打消。難道現在陳獨秀的取消主義和叛逆是沒有歷史的深遠的來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黨開始由智識分子的小團體變為工人羣衆的黨。然在這一高潮中起了相當的組織的和領導的作用。這一高潮首先就是證明中國無產階級之領導的能力與作用，打破陳獨秀馬林以至鮑羅庭等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勢力之不相

信和輕視。陳獨秀在相當的短時期中，似乎多少變動了對於革命動力的機會主義觀點。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張學良出兵鎮壓上海工人，郭松齡事變及吳佩孚攻取河南之後，又使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勢力發生悲觀，對於時局發生不正確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漢時期就實行陳獨秀主義之機會主義的實際政策。

第一、改變只要左派國民黨的方針（堅決打擊右派，削弱中派和強大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左派）號召國民黨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領回廣東，這是三月事變的主觀原因之一。

第二、對三月事變完全採取無原則的退讓政策，并實行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阻滯廣東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開始後，即將獨立的工人運動隸屬於蔣介石所要挾的民族利益之下，實行阻止和削弱罷工運動的方針；同時擴大鄉村聯合戰線的口號，去阻滯湖南高漲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動中實行「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維克策略。

第五、對於已經開始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代表蔣介石採取卑鄙的屈伏退讓政

策。

第六、北伐出發，鮑維庭同陳獨秀完全把廣東交於李濟琛，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層政策。

上面這些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就規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上海和廣東之大失敗。現在再看武漢時期陳獨秀主義之實際政策。這一時期，陳獨秀主義與鮑維庭主義混合起來，有名的西北學說的理論與實際成爲陳獨秀主義之變形發展。他的主要內容是：（一）迴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回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三）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四）向小資產階級讓步；（五）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六）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詳見我的黨的機會主義史）。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之斷送於陳獨秀主義及其變形的西北學說之手，難道還不顯明？

五

武漢失敗後，陳獨秀進到消沉與動搖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他不僅頑固的拒絕承認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開始演進到取消主義和合法主義的階段。一九二七年七月

底，他向臨時中央局提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交於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左派政權下進行下層羣衆日常工作；（三）暫時專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需作，以避過大的犧牲和破壞，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勢力的方法——取消主義合法主義。

以爲資產階級完全勝利了，革命完全沒有了。現在要緊的只是怎樣迴避犧牲保全勢力——這就是陳獨秀主義發展到取消主義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時，他提出下列主張：（一）蘇維埃口號現在不宜採用，（二）農民運動應在四不主義（不納稅，不還債等）的限度下進行；（三）中國共產黨不能一黨包辦革命，如譚平山等仍應與之黨外合作。

這一取消主義的「溫和」綱領，難道不是中國孟塞維克路線之繼續向前發展？

六

陳獨秀拒絕出席黨的六次大會，違抗兩年以來共產國際的電召；他只是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犧牲了我和平山」。然則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不可。南京政府向蘇聯進攻的冒險事業，就成了他的最後的轉變。他向中央進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資產階級工黨」的大綱。

他對中東路事變的態度根本是站在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上，絕對的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觀點相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自來就是帶着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影響跑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現在仍然不得不帶着這副本面目跑出中國黨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關心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之被攻，而且只關心於國民黨強盜統治的中國之變為塞爾維亞第二。他們的主要藉口是：「此時中國大多數民衆尙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擁護蘇聯的口號」。他所謂大多數民衆自然是把工人與資產階級混在一起。經過長期激烈的階級血戰之後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陳獨秀看來還是這樣落後，這樣不能了解擁護蘇聯口號。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在一九二三年認定中國工人「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國家的覺悟」，現在經過七年以上鬥爭，中國工人已有了「國家的覺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這個一九二三年所他說的中國工人對照起來已經是大進步了！陳獨秀先生！你不是沒有進步的呀，拿你的進步，與你所想像的中國工人的落後或進步去比較：你是進步得更遠了！中國工人只領導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而你却領導塞維克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進到公開反革命！陳獨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口號」罷，你自己的「反對誤國政策」就是你們自己的階級口號；改組派同你們一樣的採用此口號：

陳獨秀對於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取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完全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自始至終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一切階級關係都用資產階級做中心來決定。看他怎樣說一九二七年的事變：

「這一種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加增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之殘餘！爲自存計，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這「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他絕對不會夢想到由這一轉變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會夢見的。爲什麼呢？因為他的中國革命的圖表素來就是這樣預定的：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發展資本主義，再來做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現在陳獨秀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完全過渡到托洛斯基主義，這是一點也不奇

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由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完成了，封建勢力不在了，帝國主義讓步了，現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以後再來幹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不要了，以後直截了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之共同立場。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自來在陳獨秀腦中就沒有設想過，直到現在依然不能設想。因為他所能設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末一定是資產階級勝利，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那裏會有什麼工農專政這回事。中國資產階級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已經勝利了，已經「形成了自己為中心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再則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陳獨秀看來簡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會了解，因為這與他素來所設想的相去太遠了。他素來設想的革命主要動力是資產階級，若失了資產階級這革命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然則現在革命動力既然把資產階級除外，而革命任務又要反對資產階級，——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

所以陳獨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國民會議」做目前政治任務的中心口號與中國共產黨工農民主獨裁和蘇維埃口號相對抗。陳獨秀自來就不贊成採用蘇維埃口號。托洛斯基咒罵在武漢失敗後，採取此口號是犯了罪惡。不是別的，只是因為牠們認為蔣介石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現住所應有的任務只是召集國民會議來做議會

行動，合法運動，及「取得一些自由」罷了。這不是新的，仍是發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義的大綱。

在這樣的取消主義之下他們自然要拚命否認中國革命高潮，用反對「盲動主義」來做阻止與破壞高潮的藉口。陳獨秀曲解列甯兩個波濤間的話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其實他在武漢失敗時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將來很難再起。從他看來中國的事變似乎已經證實了他與彭述之的革命階段論：現在是南京政府穩定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長的歷史時期現在所有軍閥戰爭不過是資產階級發展的過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預言蔣介石制度的隱定。國民會義的口號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國革命低潮上面。

陳獨秀把自己裝做是革命勢力「保全者」極力咒罵八七以來共產國際與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犧牲了幹部如何喪失了革命勢力，那麼我們首先看他在武漢政變時用什麼政策「保全」革命勢力；他同鮑羅廷規定投降的政策來「保全」革命勢力——自動退出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領導權政權工農組織交給國民黨左派，用「適合工商業利益的政綱」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時沒有共產國際堅決的出來打碎你們這一「保全」革命勢力的投降政策，還有今日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黨嗎？還能取得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麼？你們自命為革命勢力的「保全」者和反對盲動主義的英雄，實際你們只是可恥的投降者，頑固的叛徒。再看你們七月會議的大

綱十一月的大綱（一九二七）以至中東事變後的大綱，難道你們革命勢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還不顯明麼？

七

陳獨秀現在全身投到托洛斯基的懷裏，用托洛斯基的旗幟來迴護他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來破壞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來進攻共產國際。他無恥的宣言他的錯誤是在所謂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之下做出來的。他宣言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工農民主獨裁，而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盲動主義的策略。他咒罵現在工農革命的高潮為「土匪式的擾亂」侵犯了資產階級的勝利「與穩定」，使他們國民會議和資本主義發展的計劃遭遇困難。他不要臉的誣蔑「國際的指導却在富進攻的時候教中國黨投降，當退守的時候教中國黨胡亂的拚命」。他認為一切罷工鬥爭，街上示威游擊戰爭都是盲動主義都是土匪式的擾亂。他不僅咒罵中國黨的領導機關為官僚主義他更咒罵「國際的領導站在官僚主義的路線上」。

還在武漢失敗時陳獨秀同鮑羅廷就說「如果說中國黨是犯了機會主義那末根本這機會主義就是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國際教我們的，國際教我們加入國民黨教我們幫助蔣介石」。照陳獨秀的見解，加入國民黨就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

獨立性是鬼話」。這樣叛徒的思想難道是一九二三年國際教你們的？斷送上海暴動的勝利，對蔣介石卑鄙讓步與幻想，隸屬工人階級於民族資產階級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農運動的過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難道這些是國際教你們的？現在你們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來了：你們根本否認工農民主獨裁的路線，認為機會主義的路線，因為這一路線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是要建立蘇維埃的中國，保證他迅近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完全違犯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陳獨秀主義之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陳獨秀同蔣介石汪精衛一模一樣的咒罵「共產國際破壞中國革命」。

八

中國革命運動中之有少數派路線和半少數派路線——托洛斯基主義——現在也如俄國一樣的，假如托洛斯基主義在俄國革命中表面上能維持一種與布爾塞維克對立的第三種路線和第三種派別，那麼在中國他（托洛斯基主義）一開始便與取消主義的陳獨秀主義完全混同，以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路線相對抗。這完全是自然的因為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托洛斯基主義已經從半孟塞維克的性質完全進到反革命。所以現在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在中國所進行的不止是「八月團結」而且立即進到「資產階級

「工黨」的地位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在中國比八月圍結時的俄國，階級鬥爭的劇烈與革命復興的狀況要不同些，現在的中國（一九二七年以來）階級鬥爭這樣的劇烈，與托洛斯基主義混合的陳獨秀主義以及托洛斯基主義的本身必然迅速進到社會法西斯蒂主義。陳獨秀派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國爭中的工賊行為就表徵了這一社會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遠的將來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這一社會法西斯主義必然成爲民族法西斯主義的補充和助手。所以對於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就成爲中國共產黨最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這種鬥爭的絲毫猶疑或調和態度就是幫助了反革命。

九

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階級基礎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確的了解就要弄弱對於他們的鬥爭。比如鮑羅廷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莫斯科中國科學研究院）開口使說：「陳獨秀主義與西歐的孟塞維克主義有區別麼？我以為在業已走到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歐洲孟塞維克主義，與中國的孟塞維克主義之間是有區別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說他同歐洲的孟色維克是一樣的——這是不正確的。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承認在中國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資產階級已站在政權上，孟色維克已在中國起社會法西斯蒂主義的作用。」

不能斷定中國孟色維克主義走到歐洲社會法西主義，因為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所以說不上中國有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所以陳獨秀與他的派別即中國少數派完全不要妄想他們與其歐洲兄弟——即帝國主義國家孟色維克起同樣的作用，換過說，中國孟色維克沒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個同志用書面這樣的寫着：「假如我們現在再提出一個問題：陳獨秀主義代表什麼東西，他的社會基礎怎樣？那麼我們明白看出一種回答，以為陳獨秀代表將來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這是不正確的。社會民主黨有變成社會法西主義的傾向，有工人貴族做基礎，而且只有在財政資本和剩餘贏利發達的地方才有地位。以為陳獨秀和他的派別會成爲中國社會民主黨那就會錯誤。因為要做出這樣的結論就須要設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即開始第二個資本主義時代。照我的意見他的社會基礎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一方面是自己的社會地位與中國資產階級，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有關係的自由職業者學生等，另方面沒有脫離半封建地主的關係」。

上面的見解可以說是補充鮑羅廷的。他們做出陳獨秀主義與歐洲孟色維克主義的區別，在陳獨秀主義不會變成社會法西主義。主要理由是中國不是財政資本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工人貴族等等。這種不正確的區別和否認，不僅是建立在

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機械的對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對於中國階級關係之不正確的
的了解上面。所以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作用及其階級基礎就發生不正確的估量。

陳獨秀主義他在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總一般的證明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中國

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無論陳獨秀及其派別的個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
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但當我們要正確的判斷陳獨秀的主義性質，作用及其代表的
階級基礎時我們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
另一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工頭及少數的高等熟練工人等）及一部分
被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包圍的落後工人。不指出這兩點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
秀主義的性質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秀派與改組派及其他資產階級派別的區
別，和他（陳獨秀主義）的危險之更大。

陳獨秀主義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和被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故自來就看不起中國
的工人階級的勢力，而欲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陳獨秀主義和歐
洲孟色維克主義在一切根本問題上——如階級關係，革命動力之不正確的了解（崇拜資
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及政權性質等等沒有任何區別
；在工人階級內來執行資產階級的影響更沒有任何區別；代表貴族工人和資產階級影響
包圍的落後工人一點上也找不出嚴格的區別。毫無疑義的現在陳獨秀主義是隸屬於民

族改良主義下的社會改良主義（如四不主義，限制工人運動於部分的鬭爭，而反對工人的政治進攻，國民會議等等）。所以中國的孟色維克主義也如西歐一樣，必然要變成社會法西主義——而且正在變成社會法西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社會法西主義的前進，就等於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孟色維克的性質。如果要在他們之間找區別祇能說中國孟色維克主義轉變成社會法西主義的速度比歐洲的特別快些。因為在中國發展社會改良主義至社會法西主義的條件遠不如西歐之具備。如果這一轉變在歐洲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過程而在中國這一過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這不僅由於中國是殖民地的國家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比較，而且也是由於世界革命時期，尤其是中國階級鬥爭特別劇烈，不能容許中國資產階級工黨如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經過一很長的發展時期才轉變到社會法西主義階段，祇有在這樣的觀點上，不能籠統的說陳獨秀派完全同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因為他的命運特別短促和不固定，他的發育特別困難。

以為指出陳獨秀主義必然變成社會法西主義——就是設想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這樣機械的可笑論證，完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鮑羅庭主義近年以來顯然趨向於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他把民族資產階級通看為買辦資產階級。鮑羅庭主義對於中國的階級關係又復活了彭述之主義的「新」解釋。

鮑羅庭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必然變成社會法西主義——這對於中國黨與陳獨秀主

義的鬥爭是很有害的。 她羅庭主義是陳獨秀主義的兄弟。 這一否認的意義就見辯證陳獨秀主義。

十

對於陳獨秀主義之狹義的不正確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爲陳獨秀主義就是陳獨秀個人和其團體而與其他反馬克思主義反列甫主義以至現在還隱藏在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沒有思想上路線上的聯繫。所以爲要充分的制勝黨內右傾的危險，現在主要的危險，必須充分的了解陳獨秀主義爲中國革命中之孟色維克路線與各種已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機會主義與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關係。我們單從陳獨秀的本身還不能充分了解陳獨秀主義，縱然陳獨秀自己在機會主義的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已做出整個的系統（如以上所述的）。我們必須更從中國革命中之已發生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來觀察這一孟色維克的路線與系統。

首先來看戴季陶主義。他以民族利益爲「最高原則」。換句話說，以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爲最高原則，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對階級鬥爭，也無異是發揮一九二三年陳獨秀「只有民族鬥爭，沒有階級鬥爭」的原則。假若陳獨秀主義在五卅高潮時曾反對過戴季陶主義，那末從五卅末期和三月事變開始陳獨

秀主義在客觀上就成爲在中國工人運動中之戴季陶主義的執行者——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一直到中東路事變陳獨秀提出的「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還是隸屬於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義。彭述之主義的特質就在用左的浮詞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來幫助陳獨秀主義進行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口頭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實際上把革命領導權奉送於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彭述之主義的幫助，陳獨秀主義在黨內之宗法的統治與黨外實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之發展不能那樣順利。

再看譚平山主義。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宣佈「中國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廣大的勞苦平民爲中心，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構成民族階級與帝國主義作整個鬥爭才能實現。故中國革命充滿了階級性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就是無產者國家與有產者國家的鬥爭。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無產者國家，可謂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則發揮盡致了。譚平山比戴季陶聰明些，他不反對階級鬥爭，只把階級鬥爭翻譯成爲「被侵略的無產者民族與侵略的有產者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陳獨秀比譚平山又聰明些，他現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義來防護中國不變爲塞爾維亞第二。

最後不能不說到陳獨秀主義一個重要的伴侶——鮑羅庭主義。武漢時期鮑羅庭主義與陳獨秀主義混合爲一個東西，此處不用贅說。現在所說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後，鮑羅庭關於中國問題最近的見解和態度。

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中國科學研究院），鮑羅庭宣言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在於他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見，而他沒有把這不同的政見引到公開鬥爭；他宣言當時有廣東路線與上海路線的對抗；他的結論是：假若他的路線與陳獨秀的路線引起公開鬥爭，那就不會有武漢時期那樣的失敗。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生長的人，大約不會相信鮑羅庭的話是真實的罷！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開出席替他辯護。可見鮑羅庭主義在我們黨的隊伍中直到現在不是沒有保留重大的影響和殘餘。這一殘餘保留在黨內終於有復活陳獨秀主義的危險。所以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中決不能把鮑羅庭主義除外。

鮑羅庭在中國革命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假若說陳獨秀是中國的蒲蘭德爾，那末，鮑羅庭就是中國的拉狄克。所以他對於我們黨內同志的影響不是值不得注意的問題。首先看他對於中國階級關係的新見解：

「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相互關係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當時壟斷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經紀地位的，是以皇帝爲首的高等官僚貴族……第二個時期……即你們所知道的買辦階級；……最後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已在排擠第二時期的中間人，排擠買辦階級而開始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相互關係」。

「……資產階級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外是企圖在中國創造一種條件，在這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更能密切與帝國主義聯繫。不僅在各大商埠條約上給他與帝國主義聯繫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國。換說一句即爲帝國主義肅清在中國道路上一切的障礙，實現買辦性質於新形式中，在新環境中，於極廣大的範圍中」。這在鮑羅庭主義的信徒看來，要算是極革命的極響亮的高調了。看他的下文說些什麼呢：

「講到這一點還必須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是另外一個程序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他要把中國工業化的大道上的障礙物掃除，準備同國內的封建勢力以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資產階級」。

「當我們說到民族資產階級還極弱時，我們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指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的資產階級，但是有點工業資產階級傾向的民族資產階級，那末我們就應當說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不能引導中國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因爲這種

資產階級現在這種弱』。

原來鮑羅庭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同化之後，還保留一『不全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準備同國內封建勢力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極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還不曉得把中國引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將來怎樣呢？這點他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不難從他的觀點做出結論，就是從鮑羅庭主義的中國階級關係的觀點非走到復活『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的機會主義不止。

鮑羅庭接着上文就來估量無產階級：

「這種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是極弱的。由此就可明瞭中國無產階級也充分的弱，數量太少，他的年齡，總共不過幾歲。他的基本羣衆不在中國內地，而在租界，完全與中國隔離的香港一類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漢口你們有工業無產階級基本羣衆，而在中國其他各地，工業無產階級在真正的字義上是很少的」。

鮑羅庭新的「租界無產階級論」的論證仍然回復到自己老的西北主義的結論，就是還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國無產階級很難領導中國的農民，中國革命很難憑靠大城市的領導。所以在反動下，職工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前途，唯一重要的是農民遊擊戰爭。中國全體共產黨都要加入遊擊戰爭，如歐洲共產黨全體參加工會工作一樣。鮑羅

庭主義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終，如陳獨秀主義一樣，懷疑與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鮑羅庭主義不僅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領導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國革命之可能。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的缺點，在數量上，年齡幼稚上及其他方面，這些缺點之百倍的補償，就在不能把中國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從其他世界分開。假若拿中國無產階級從印度無產階級，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的無產階級分離起來，那末，自然不待說對於指導基本聯盟的農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難。假若中國無產階級是分離的，那末就很可能懷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擺在他前面的偉大任務，即關於指導農民與封建殘餘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等等。但假若拿他與印度無產階級，各國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無產階級共同來看。那末中國無產階級之必不可免的歷史的缺點就百倍的補償起來了。從這樣的觀點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中國資產階級。」

這是多麼漂亮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鮑羅庭却比較更進一步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國革命之可能。

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轉變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必須依靠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尤其蘇聯的幫助，這是毫無問題的；中國革命之須要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也是毫無問題的。

可是照鮑羅庭的觀點，就完全是不對的。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不僅有自己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進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東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理由，不僅在於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而尤其在中國內部階級勢力之對比上。鮑羅庭主義完全與列寧主義相反，從他自己的階級關係的分析，他斷定中國無產階級比中國資產階級更弱些，只有在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資產階級。所以他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完全建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依賴之上。

鮑羅庭主義的信徒以爲鮑羅庭同陳獨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鮑極看重農民勢力，着重游擊戰爭；縱然他在武漢時期與陳獨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現在他却與陳獨秀「根本」相反，他「異常」看重土地革命。現在來看他對於農民問題的政見：

「現在說到農民方面。與農民的關係的問題，必須指出下列的根本要點：一、不是真的在中國鄉村中已發生這樣的階級變遷，其結果已使富農分化，而這富農已同着資產階級組成南京的政權，所以需要與富農鬥爭。我不否認中國鄉村有富裕的農民之存在。但是應當說明富農是什麼，其意義就不能如我們（指蘇聯——森註）所了解的一樣，不能搬運革命以後的我們所有的富農觀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國所有富農的觀念上去。這個不是一樣的富農。說到中國農村，那就必然須要一個全體農民的共同民主

的戰線去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軍閥制度，反對一切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反對帝國主義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證列甫——森註）。土地革命在中國只有憑靠在中國農村的統一戰線上才有可能」。

此外關於國際狀況，他做了以下的肯定：「無論怎樣還沒有牢不可破的論證，證明在最近的將來，在太平洋上美與英日就發生武裝衝突。美在中國將採取最謹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話都是從羅鮑廷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報告中引出來的。這是新的變態中的機會主義的大系統，是西北主義之繼續發展：在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上——階級關係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農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與共產國際和列甫主義的路線不能並存的。假若拿了現在的鮑羅廷主義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機會主義去對照，便可看出中國革命中孟色維克路線之一貫的綫索。這一路線的中心點，是在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和對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統一戰線之孟色維克的了解：從隸屬無產階級於資產階級（武漢時期以前），做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尾巴（武漢時期）以至聯合富農。假若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觀點來攻擊中共中央之業已改正的聯合富農的錯誤，那末鮑羅廷在同年就全國恢復以前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與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內

外相應。由此不難推想：假若中國共產黨真正執行反富農路線到底時，陳獨秀主義便會同鮑羅廷主義一樣暴露其代表富農的真面目。

十一

陳獨秀主義一直至今有他的三個不可分離的機會主義同盟：即彭述之主義，鮑羅廷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彭述之主義早已喪失其獨立的影響，因為一方面他早已溶化於陳獨秀主義，另一方面鮑羅廷主義已攝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現在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實成爲陳獨秀主義左右之手。假若陳獨秀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共同點在忽視土地革命，忽視農民爲革命的動力及不了解工農民主專政；那末陳獨秀主義與鮑羅廷主義的共同點就在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勢力與領導，輕視中國革命之內部的階級力量，及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解爲隸屬於資產階級——自民族資產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的通常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與陳獨秀主義的堅決鬥爭，同時就要求打擊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

公開的陳獨秀派和托洛斯基派在表面上現在雖然已驅逐於黨外了，但他暗藏在黨內的影響，特別是他的友軍鮑羅廷主義的影響還很嚴重。不少可愛的同志在思想上還不能完全從他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如對於富農，對於階級關係，職工運動和遊擊戰爭之不

正確的了解等)。這樣的現象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中決不應當忽視。爲要澈底肅清陳獨秀的主義在黨內的殘餘，就要求這些同志在以後能自覺的與陳獨秀主義的同盟者鮑羅庭主義在思想上完全脫離關係。不然，黨就應該作不客氣的鬥爭。

十三

與「陳獨秀主義鬥爭的任務，尤其要執行於一切實際工作，羣衆工作，黨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發現的各種各色的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之中，一切尾巴主義，黃色傾向失敗情緒，合法主義，和平發展傾向，黨內調和傾向，盲動情緒，保守觀念，極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發展都可變成陳獨秀主義的支流；隨時隨地制勝這些傾向，其意義就是制勝陳獨秀主義。中國革命中和我們黨中的危險現在主要的是右傾的危險。譬如富農路線的錯誤，在上級指導機關，雖然改正，但在實際工作上和在下級黨部中，嚴格的說，還是沒有改正過來，有些地方還正在發展。反對農民分土地，固然是富農路線，同時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發現了富農路線——如閩西分土地定出以生產工具及資本爲標準，顯然的是富農路線；同時在閩西蘇維埃區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資」之不正確的提議也開始發現。

爲要制勝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首先要要求對於革命的性質，目前階級關係的變遷，

及革命發展的形勢有正確的了解和估計；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絲毫錯誤都是幫助了陳獨秀主義。托洛斯基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誇大資產階級，看不見封建殘餘勢力，因此完全忽視土地革命；而事實上是企圖幫助資產階級來建立他們所「夢想的穩定」去實行國民會議制度；鮑羅廷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停留於他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階段；誇大封建勢力，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企圖貫徹把中國革命隸屬於資產階級利益之下的路線；即把以前隸屬於城市資產階級的路綫變成隸屬於鄉村資產階級的路綫。這一孟色維克路線的危險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帶現實性的主要危險。陳獨秀的根本立場，就是要利用托洛斯基主義的遮飾來實現這一孟色維克的路綫。在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兩者都絕對沒有目前階級關係和革命任務的正確觀念，尤其兩者都絕對沒有革命轉變的觀念——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有些同志在反對陳獨秀主義的過程中，常常發現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觀念，或鮑羅廷主義的錯誤觀點，尤其是後者佔多數。常常有人把反對富農的路綫與反對地主的路線對立起來，常常不了解在中國土地革命中之反富農是同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之反資產階級的總路線是一致的；常常有人過於誇大封建勢力而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因此，又隱隱的發現復活以前的兩個革命階段論的傾向而完全忽視革命轉變

的觀點。這些都證明右傾是中國共產黨目前之主要的危險之表徵。他們不能正確的瞭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過程：當他們「嚴格的」區別革命的性質及任務時，便連革命的過程——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時，也把他完全劃成鴻溝，以爲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有一道「萬里長城」（陳獨秀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就是這樣看法）；或則完全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而不自覺的墮落到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種「右的」錯誤實際是幫助了陳獨秀主義。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是長的過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爲他具有很優越的轉變的條件——國際的和國內的。國內的條件，如一九二七年以來，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革命領導權；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蘇維埃區域之建立，無地的貧農，僱農，苦力以及地少的中農佔鄉村人口之絕對多數；城市大工業具有相當的經濟前提，（此前提在工農民主專政的過程中更會大大的加強）；最後尤其是中國革命之反帝國主義的特性，和反資產階級的特性，——自城市資產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基本羣衆已在而且正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反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國際的條件，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大工業化與農村的集產化之異常迅速的發展，歐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穩定」不僅劇烈動搖而且開始崩潰。這些條件對於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

義革命都有決定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應堅決的明確的站在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的路線上，來執行中國革命目前階段上的任務，同時準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前提。他絲毫不為企圖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左的」機會主義托洛斯基主義所動搖。同時，更絲毫不為企圖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右的」鮑羅廷主義所動搖。他一定要澈底的克服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的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他一定要領導現在的革命高潮迅速進到直接革命形勢，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中國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由工農民主獨裁轉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制。

打倒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

全體黨員站到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路線上來！

（完）

反列寧主義的布哈林

八二
少 林

(一) 聯共黨內的右傾問題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應該要明瞭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黨內的右傾份子如布哈林的言行，離開了黨的總路線，反對黨的策略。現在蘇聯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的機會主義。這右傾的機會主義，在蘇聯問題上，有些什麼主張呢？簡單的說來，就是他們主張在鄉村中不要阻礙富農經濟的發展，彷彿允許了富農的自由發展，富農就會送麵包來給我們吃的。右派忘記了富農是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我們不能去增加我們的敵人的力量，而削弱自己的工人階級！如果黨採取了右派「贊助富農的方針」，那末，富農在鄉村之中，可以成爲全國糧食的主人，而且可以引導農民走到資本主義的道路，剝削農民羣衆，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右派不懂得祇有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上，去改造鄉村經濟，是使蘇聯消滅「糧食困難」的唯一出路；「領導中農貧農的羣衆，實行「集體農莊」運動，鞏固「集體農莊」經濟，並且設立許多蘇維埃農莊，進攻富農，以至消滅富農——只有這樣，才能改造幾百萬農民經濟，保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

右派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害怕國難，害怕階級鬥爭的劇烈，認為在鄉村中進攻富裕農民，排擠資本主義成份，是不對的，應該向富農採取讓步的政策。

富農用各種方法反對集體農莊運動，而稱讚個人經濟的好處。爲什麼？因爲集體農莊剝奪了富農剝削農民的可能。右派却首先不贊成黨特別去注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他們說，「農民羣衆不會加入這些集體農莊的」。右派不願意承認，小的個人經濟，已經不能保證，不能夠改良貧農中農羣衆的狀況，只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可以比個人經濟，有更高度的生產。

富農不願意出賣麵包給蘇維埃政府，要使城市工人受餓。所以，蘇維埃政權和農民基本羣衆，親密的聯合着，對於富農，投機商人以及一切私藏糧食的人，採取「強迫」的政策。富農當然是不得意的。右派也是不得意的。右派說：不可以「強迫」富農。富農要求國家准他們自己定出糧食的價格；右派也說：應該定出高一點的糧食價格。右傾反對派向富農讓步的觀點和他們所提議的實行辦法，正是幫助富農，幫助鄉村資產階級，而對於無產階級是不利的。

右傾反對派對於農村經濟方面的觀點是如此。至於說到工業方面，右派雖然不敢公開反對蘇聯社會主義進攻的政策，可是他們不贊成黨採取生產速度加快的辦法。他們認為這種速度，彷彿是蘇聯所不能勝任的。他們不能夠懂得，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應該趕快加緊的進行，應該用全力在最短時期內，趕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程度。——這種「趕上並且超過列強」的口號，是列甫所提出來的。右派因此不同意「五年經濟計劃」，認為應該要減少對於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

右派對於國際政策方面，他們看輕資本主義營壘的內部矛盾的劇烈，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改造，資本主義穩定，可以鞏固，他們只看見資本家的勝利，不看見工人羣衆的左傾和革命運動的高漲。用不着說，右派的觀點，是列甫主義路線的仇敵，他們曲解列寧主義。過去的一年，完全證明了右傾反對派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實際的經驗，已經打碎了右傾反對派的預言，說黨的政策是要破產的；並且證明黨是執行了正確的列寧主義的路線。現在，不但以前那些黨內的懷疑派（右傾分子）要承認，甚至於外國資本家的新聞記者和專門家，也不得不承認蘇聯農村集體農莊的力量，承認蘇聯採取的五年經濟計劃，是一定可以實行，而工業化的速度，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了。

右傾反對派是農村中上層資產階級和富農羣衆的情緒和希望的傳達者，他們不願意放棄反列甫主義的觀點，他們停留在派別行動的道路上，在黨內組織自己的小組織，向黨的路線作鬥爭。

右傾反對派的觀點，表示得最完備的，就是布哈林。布哈林同志在黨內有很大的功勞，例如他反對過「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加米聶夫，季諾維夫等），托洛斯基派（所謂托季反對派聯盟），曾經幫助黨的路線，做過劇烈的鬥爭。同志們應該要注意：在不久以前，布哈林同志還很有力的很堅定的反對「托季反對派」，而現在忽然自己跑到「右傾反對派」方面，——這種變化不是偶然的，不是沒有「準備」的。布哈林在和托洛斯基派鬭爭的時候，就提出「大家發財」的口號。當然，黨不能接受這個口號，斯大林同志直接說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布哈林的口號與列寧主義的路綫，是不同的。如果不糾正布哈林的許多不正確的觀點，那末對於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等，一定有極大的害處。青年的黨員還沒有知道：布哈林還在與托洛斯基派鬥爭以前，就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已經屢次反對過列寧的意見，他的根本觀點，是和列寧主義不相同的。

在與托洛斯基派鬥爭的時候，托洛斯基派的信徒，尤其青年，知道了托洛斯基從前向來沒有在多數派方面，而是在少數派方面的，他曾經屢次向列寧主義和黨的政策，做過鬥爭，這樣，他們就拋棄了托洛斯基主義。當時聯共提起了托洛斯基從前的行動，去和托洛斯基取消派鬥爭。現在我們爲着幫助中國黨，也必須重新提起布哈林從前屢次違背列寧主義的錯誤和傾向。

因爲布哈林像從前一樣，他又動搖了，因此，必定要提出他舊的錯誤，方才更使我們明白他現在的錯誤。使我們知道：他的離開黨的路線，並不是偶然的。

(二) 布哈林對於戰爭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錯誤 (1914—1919年)

一九一四年歐洲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布哈林就和列寧有不同的意見，當時布哈林在戰爭問題上，是反對列寧和俄國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列寧以爲當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就是把這個戰爭變成推翻地主資本家的革命；應該把各國工人相互殘殺的武器，掉轉頭來去反對各國的統治階級。『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這是在戰爭的時候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的口號，當時布哈林雖然沒有顯明的反對這一口號，但是，他同時提出『和平』的口號（和當時還沒有加入黨的托洛斯基一樣），他提出這『和平』口號，事實上是削弱，模糊『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是一個新的號召羣衆推翻剝削階級的革命的口號；如果只是簡單的說『不要戰爭，大家和平罷』，那末，這就等於把工人階級往後拉，世界大戰以前，也曾經有過和平的時期，當時資產階級是『和平的』剝削了工人階級好幾十年，——現在只說，『大家和平罷』，豈不是請各國資產階級回過頭去再來『和平的』剝削工人麼？！這種口號，絲毫沒有革命意義，絲毫沒有無產階級的氣味。

因爲一切普通的人民，甚至於市儈，他們都害怕戰爭，亦會要和平而反對戰爭的，這種簡單的宣傳『和平』，是轉移工人階級的注意力，使工人階級不能專心一致去鬥爭，以達到變戰爭爲革命的目的。所以列寧說：這是『牧師式』的不革命的口號，簡單的宣傳和平，亦是欺騙工人的一種方式罷了。其實就是資產階級自己，等到打仗打弱了的時候，也會高叫『和平』呢！

說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無產階級應當希望『自己的』國家失敗的問題（所謂失敗主義），布哈林又和列寧是不同意的。失敗主義是什麼呢？——如果『自己的』政府失敗了或者削弱了，這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要實行推翻俄皇專制政府的無產階級當然是很有利益的。因此無產階級是要『自己的』政府失敗的。對於俄皇政府愈不好，對於俄國工人階級也就愈好。列寧說：『否認這失敗的口號，就是假革命』。布哈林却曾經反對這一點；這和當時的托洛斯基派又是相同的。托洛斯基派，和其他的半社會主義者半國際主義者一樣，他們當時口頭上反對戰爭，贊成國際主義，事實上，他們對於真正革命的口號和鬥爭，却是反對的。布哈林在戰爭初起的半年之中，堅決主張黨應當和托洛斯基接近。當時俄國的黨，對於這幾派的態度，却是很小心很謹慎的，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一九一五年二月，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國外組織，在瑞士白恩地方，召集了國外會

議（這就是所謂白恩會議），布哈林在這次會議上，堅持他自己的政綱，反對列寧。但是，白恩會議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列寧指出布哈林這種觀點的錯誤，他說：「戰爭把布哈林推到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方面去了」。譬如布哈林勸告工人說，——在資產階級政權統治之下，政權還沒有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以前，——各個單獨的工人團體，可以去奪取已經關閉的工廠和糧食的倉庫，他並且認為這種奪取的辦法，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其實當時應當使工人階級的全部力量，首先注意去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是這樣，那就要分散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使工人階級的任何勝利，都不可能。而且照布哈林的意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沒有奪取政權以前，就可以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列寧批評布哈林的這種觀點，說他是「蠢到萬分，是半無政府主義的」。因為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是這樣不懂得國家政權的意義和作用，所以列寧不得不很激烈的反對布哈林。

照理說，布哈林在白恩會議之後，應該要放棄他自己的錯誤觀點，整個的站到中央路線上來。但是幾個月之後（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和列寧之間，又發生了不同的意見——而且是非常之嚴重的，就是關於民族自決權的重要問題。布哈林認為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例如中國印度等，為着自由和獨立而鬥爭，都是用不着的。他沒有看見這些國家的鬥爭，是在動搖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而且這也是無產階級

反對資本主義的，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輔助的力量。尤其在俄國，關於民族問題，有更重大的意義。例如烏克蘭，波蘭，芬蘭等等是在沙皇壓迫之下的。如果不去爲民族自決權而鬥爭，那末也就不能夠爲社會主義爲民權主義而鬥爭。列寧說：「如果社會主義者，不去爲着烏克蘭，波蘭，芬蘭等民族自決的自由而鬥爭，那末這種社會主義者，就簡直是背叛民權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幫助了俄皇」。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夠不管民族運動，決不能夠宣傳工人，要他們輕視那種反對俄皇帝國主義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他們這種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我們不管什麼民族自決權的鬥爭，我們的工作，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這簡直是世界革命的叛徒的鬼話。這是看不到中國印度等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對於共產主義的鬥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大家要很清楚的懂得，我們工人應該對於這些鬥爭，表示極大的同情，應該用各種方法，去幫助這些鬥爭。布哈林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曾經反對過「民族自決權」的口號，這就是他間接的幫助了帝國主義。因此，列寧直接指出布哈林的觀點，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如果照布哈林的意見，那末，蘇維埃共和國，任何時候，也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布哈林在歐戰的時候，對於民族問題的策略，表面上是很「左」的，很「革命

的』，但是在實際上，是暗中藏着右傾的『實質』。布哈林講的話。似乎是比较更『左』些，更『革命』些，但是實際上，很顯明的，恰恰上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當，因為他的政策，一點也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去壓迫殖民地和弱小民族。

我們不要以為布哈林和列寧之間的分歧，只不過在歐戰的時候，以為他在十月革命之後，就拋棄了自己的錯誤。事實上，甚至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布哈林還是堅持自己的錯誤。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一年半中，他又改變形式，在俄國黨的第九次大會上，企圖反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因此，列寧又詳細解說布哈林的錯誤，并指出在蘇維埃共和國裏，革命的無產階級尤其不能夠反對這個口號。列寧用波蘭問題來做例子。波蘭的人民，被俄皇壓迫了一百多年，因此波蘭的一切人民，甚至於工人之中，都有不信任大俄羅斯人的情緒。說蘇維埃的俄國，表面上是共產主義的旗幟，實際上也和俄皇一樣，要來壓迫波蘭的人民。布哈林提議，說我們用不着承認民族自決權，等於幫助和鞏固波蘭勞動羣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只有承認民族自決權是正確的的政策，才能夠澈底的消滅波蘭勞動羣衆不信任無產階級國家的態度，——這才表示無產階級的國家，和從前壓迫過波蘭的『俄羅斯』是不同的。

(三) 布哈林對於國家問題的錯誤

歐戰的時候，布哈林對於國家問題，又和列寧發生分歧。一九一六年布哈林替國外的一項青年雜誌，做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許多錯誤。列寧說，在這些錯誤之中，有很重大的錯誤，就是模糊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關於國家問題的分別。布哈林「抹殺」了他們之間不同的地方，而自己走到半無政府主義方面去了。在布哈林的結論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也應該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否認一切國家，對於一切國家都要仇視，一切國家都是不能利用的，因此，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不能得到明確的觀點。列寧向布哈林這樣解釋：「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中，是贊成利用現代的國家及其機關的；同樣，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亦贊成利用國家，做一種特殊的過渡方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種過渡的方式，而無產階級專政，亦是國家呵」。

列寧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認為戰爭要產生革命，已經是沒有疑問的了。既然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到了移轉國家政權到工人階級手裏的時候，那末，黨對於國家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應該有完全明確的觀點，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當時最出名的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正在曲解馬克思關於國家問題的學說，使這種學說，能夠適應資產階級的利益。布哈林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清楚的懂得；第一，他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長期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正需要

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第二，他不懂得需要無產階級的專政，不但是爲着要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還爲着要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因此，一九一七年列寧說：「在反對考茨基主義的鬥爭中，布哈林的錯誤是能夠亡黨的！」

這樣，我們可以看見，在歐戰的時候，布哈林對於極重要的許多問題，曾經有過很危險的動搖；所以列寧不能不對於布哈林有這樣的批評：「布哈林在政治上是非常不穩定的」。這裏批評的確是無爭論的。隨後還有許多事實，證明這種批評，的確是極端的正確。

（四）布哈林對於黨綱問題的錯誤（一九一五——一九一九年）

蘇聯共產黨的舊黨綱，分做兩部分：一是最高限度黨綱，二是最低限度黨綱。最高限度黨綱，說明我們最終目的，——社會主義；最低限度的黨綱，敘述最近期間的要求，這些要求，還沒有說到社會主義，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之內，可以實現的要求。

- 換一句話說，當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最高限度的黨綱，但是，當政權還在資產階級手裏的時候（譬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我們要提出許多要求，例如秘密投票的普選權，公民個人的不可侵犯權，消滅等級，教堂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堂分離等等。從一九一五年起，

布哈林表示要取消最低限度的黨綱。列寧當時知道了一個英國的社會黨，也要想取消最低限度的黨綱；因此他就站在擁護最低限度黨綱的觀點上，說「布哈林亦是在這個問題上，受了引誘犯了錯誤」。二月革命之後，布哈林又表示黨應該把最低限度的黨綱取消，列寧反對他說：我們首先要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然後再來說取消最低限度黨綱的話！現在我們既然還沒有奪取到政權，政權還在資產階級手裏，那末，我們不能取消這個最低限度的黨綱。「因為說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之內，我們一點不要向資產階級要求，一切都要靠自己來實現，用不着做瑣碎的小事，——那就等於空洞的誇大狂」！「我們的勝利，現在還沒有達到，我們的頭腦，却已經沒有了」！工人階級沒有達到最後勝利以前，要克服很多困難，在這個過程中，有失敗和退却的可能！我們要很堅決很不動搖地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既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勝利的目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以為自己似乎已經勝利了。這樣輕意的取消最低限度黨綱的主張，是犯了誇大狂。列寧的意思就是這樣，他用以下的格言來提醒布哈林。「去打仗的時候，不要誇口，打完了仗再誇口」。

一九一八年蘇聯共產黨第七次大會和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大會上，爲了黨綱問題，列寧又和布哈林鬥爭，布哈林提議在黨綱的理論部門中，只要敘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列寧認爲應當敘述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從資本主義極簡單的

形式起，一直到帝國主義階段為止，換一句話說，不但要像布哈林那樣，只看見資本主義的最高最複雜的帝國主義階段，有銀行交易所大企業股分公司等等的階段，而且還要看見極簡單的資本主義，——從小的農村經濟，小的商品生產裏，每天每小時所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

黨綱裏必須指出簡單的資本主義形式，這是因為要明白的提出農民的經濟性質和我們對於農民的政策。農民裏面的富農，正是從糧食買賣的投機，從小商業裏的盤剝等方法中，生產出來的，這種投機事業和一般的商品買賣，亦是資本主義呵！布哈林恰好不懂得這種明白指出簡單的資本主義的必要，所以列甫說他對於黨綱問題的主張，是「書生式」的主張。

(五) 在白萊斯德和約時期的左派共產主義(一九一八年)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工人階級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使俄國脫離帝國主義的戰爭。破產的窮困的蘇聯，在那時候，再也不能夠繼續戰爭的了。兵士已經受苦了三年，軍隊完全沒有戰鬥力了。兵士在十月革命中，贊助工人，正是因為希望蘇維埃政權快些給他們和平。如果蘇維埃政權，不顧到幾百萬兵士的情緒，——這幾百萬兵士中，大多數是農民，——而還要繼續戰爭，那末，蘇維埃共和國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爲軍士上的優勢，無條件的是在德國帝國主義一方面。德國帝國主義靠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向蘇聯提出極苛刻的講和條件。當時蘇維埃共和國，就應該選擇一下：還是繼續戰爭呢？——再繼續戰爭，是一定要滅亡的；還是承認極苛刻的，極不利於蘇聯的和約，可是這可以給國內人民歇一口氣，去準備新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是很堅決的主張：不管怎樣的苛刻的和約，是應該與德國講和的，這是救濟革命的唯一方法。——當時，蘇聯的命運，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布哈林同志，自稱爲「左」派的共產主義者，主張要「實行革命的鬥爭」，而很激烈的反對列寧，用各種方法，企圖破壞列寧的講和政策，要拉蘇聯去戰爭。在這裏，我們應該要記得：當時一切資本家，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也要想把他們所痛恨的蘇聯，拉到戰爭中去，以達到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當時無產階級利益，是要講和，資產階級利益，却是要戰爭。所以列寧說：布哈林贊成鬥爭的「左傾主張」是上了資產階級的當。當初列寧在中央委員會上，是占少數的，——贊成列寧的只有斯大林，季諾維夫等，其他大多數，是贊成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的。

托洛斯基對於德國和約的回答是這樣：「戰爭，我們是並不實行；和約，我亦不簽字；軍隊可以解散」。布哈林同志贊成托洛斯基，認爲德國軍隊是不會來進攻的。於是，那時候的中央中間，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主張勝利了。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

政策，得到了極壞的結果。在白萊斯德地方，德俄講和會議上，托洛斯基聲明：「戰爭，我們是不要；和約也用不着要簽訂」。德國帝國主義者，聽見蘇俄政府的代表（托洛斯基），這樣聲明，就立刻下令進攻。那時候俄國已經絕對沒有組織有戰鬥力的軍隊，就大大的恐慌起來，各地方的戰線，都崩潰下來，兵士羣衆，亂七八糟的退下來——喪失了幾千尊大炮，幾千萬財產。托洛斯基布哈林的政策，結果是：在幾天之中，使蘇聯到了將近消亡的地步！在蘇聯軍隊失敗以後，列寧才在中央得到了一個轉機，決定要簽訂德國的和約（布哈林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投票反對列寧）。當然這個和約的條件，比失敗以前更要嚴重了，更其不利於蘇聯了。可是，簽訂白萊斯德和平會議的條約，始終是救了蘇聯的滅亡。列寧寫道：「事實告訴我們，布哈林否認德國進攻的可能，在事實上是幫助了德國帝國主義。新和約的條件，比以前的「更不好，更嚴重，更可恥了」這都是我們的可憐的「左派」的不好啊」。

布哈林當時反對列寧，企圖堅持自己的「左」的主張，是幫助了資產階級，削弱了無產階級，列寧寫得很對：「如果照布哈林的政策去做，當時就是有好的革命，也要弄到滅亡呢！」

在這時期中，布哈林很激烈的反對列寧和列寧的策略：布哈林退出中央委員會，進行自己的小組織，目的是要破壞列寧所實行的政策，他出版了小組織的報紙，在這報紙

上，特別攻擊列寧個人。布哈林在大會上，受着了失敗：他在這大會上，做了副報告，反對列寧的報告，可是大會上大多數，都贊成列寧，反對布哈林。大會之後，布哈林應當服從決議，去進行黨的路線了。可是他仍舊繼續他的小組織工作，在這一時期中，布哈林的行動，很明顯的是有分裂黨的企圖。當時布哈林一派，提出辭職，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退出政府，列寧就簡直不容氣的說：這是布哈林派的分裂政策。但是，當初被布哈林的革命空談所吸引的工人們，很快的明白「左派」共產主義的一切錯誤，拋棄了布哈林的小資產階級的所謂「左傾」政策。因此「左派」的領袖變成了「沒有軍隊的將軍」，——他們的分裂政策，沒有能夠實行。從布哈林登載在自己小組織的「共產」報上的文章裏面，就可以推想到當時列寧所受着的，是何等重大的一擊，照布哈林說來：列寧對於戰爭和講和問題的立場，是「機會主義的立場」（就是說，這是妥協的，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益的立場），這是「絕無開欄的空談，可以斷送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近視眼的策略」，「機會主義的空談」。我們尤其應該要指出來的：是布哈林把列寧和德國少數派考斯基去比較。考斯基在口頭上是革命的，但是在事實上是實行妥協政策的，照布哈林的意思，「列寧在實際上，是重複了考斯基的錯誤」。在歐戰的時候，考斯基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問題，做了些什麼錯誤呢？他「是反對革命，蒙蔽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並且轉移工人階級的注意力，使他們不

注意那反對帝國主義的艱難困苦的暴動戰爭」。『列寧現在也犯了反對革命的……錯誤』！列寧在布哈林的『左派』『共產』報紙上，受到這樣重大的攻擊。

在一九一八年，列寧與布哈林之間不同意的問題，不僅僅限於戰爭和和約問題。就是在蘇聯國內政策，蘇聯的經濟改造中主要問題上，布哈林與列寧的意見，也是不同的。布哈林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計劃，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彷彿不能夠與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并存的。他說，列寧的思想是『妥協的』。他反對利用資產階級的工程師專門家，來做恢復俄國經濟的工作，他不相信無產階級有能力去指揮他們替社會主義工作；他反對工廠裏實行勞動紀律，認為這是束縛工人的政策；他又反對每一職務中的『個人負責制』。在這許多情形之下，布哈林和『左派』的共產主義者，實行反對多數派的列寧主義，而去與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攜手。這就證明了布哈林同志和所謂『左派』，是實行了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他們所宣傳的觀點，實在就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觀點。

一九一八年『左派』反對黨的鬥爭，走到怎樣的程度呢？看看當時社會革命黨左派，很正確的看到『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觀點很接近他們自己的政策，因此，社會革命黨在左派中間的人們，曾經走到布哈林那裏，和他商量共同實行一個政變的計劃，商量怎樣逮捕列寧和人民委員會委員。這些談判，當然是在黨的背後秘密進行的；而且在

許多年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這個問題，還是有一次布哈林自己說出來的。當時社會革命黨與「左派」共產主義者，並沒有商量成功，過了一些時候，社會革命黨左派，就單獨的實行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當然，這次暴動，立刻就被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府撲滅了。

(六) 蘇聯「過渡時期經濟」的問題(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〇年布哈林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叫做「過渡時期的經濟」。在這本書裏，他要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布哈林把這本書供獻給列寧，但是，列寧看了這本書的內容和傾向以後，就拒絕了這個「供獻」。

列寧讀了布哈林的書，就在書的邊上，批出布哈林錯誤的地方。他說，布哈林不是一個嚴格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布哈林常常是這樣的：他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是對的，是照着馬克思的學說的；但是，解決別個問題的時候，就不對了，就不照着馬克思的學說，是照着卜克唐諾夫的方法了。讀者應該知道布爾塞維克的歷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在俄國黨內布爾塞維克的一部分之中，在哲學方面，有些人開始發現了動搖和猶豫。馬克思主義唯物哲學的觀點，本來是整個布爾塞維克宇宙觀的基礎。這些同志都開始宣傳一些奇怪的

觀點，這些觀點好像是「科學」的，很「精細」的，對於沒有學過的人，簡直不能懂得的，不通俗的，可是實際上，這些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離開唯物論的，跑到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和牧師主義方面去的。這一派的布爾塞維克，卜克唐諾夫也是其中的一個，在他們自己的哲學著作中，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爲着要暴露這些動搖，爲着要保證布爾塞維克黨的思想的統一，爲了擁護唯物主義，列甯就在一九〇九年，著了一本很大的關於哲學問題的書，這本書在黨的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黨內哲學問題意見分歧最激烈的時期中，布哈林的哲學意見與列甯是不同的，而與卜克唐諾夫是相同的。在一九〇九年，布哈林已經與列甯離開，他已經不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觀點，從馬克思主義一跳到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的理論方面去了。這是很重要的，應該指出的，因爲在最後的幾年中，布哈林所寫的著作中，仍舊發現許多卜克唐諾夫觀點的影響。列甯在一九二〇年還指出：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卜克唐諾夫主義的。在這本書裏，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布哈林的立場，亦有很大的錯誤。

（七）工會問題的討論（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〇年的年底和一九二一年的年初，正是新經濟政策代替「軍事共產主義」之

前不久，蘇聯共產黨裏，發生了一次極嚴重的討論，——工會的作用和任務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是托洛斯基所開始的，列寧是反對討論的，布哈林都是贊成討論的。這次討論對於蘇聯的黨，有了很大的害處，因為這次討論，使蘇聯共產黨，不能夠充分的去注意當時最實際最緊急的任務：國內戰爭完結，過渡到和平建設的關頭，正要規定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

當工會問題討論的時候，蘇聯共產黨中，形成了好幾派。布哈林亦組織了自己的派，布哈林派，最初彷彿是想站在托洛斯基派和列寧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派之間，成立一個緩衝派，或者所謂中間派。當時贊成列寧的是斯大林季諾維夫等。而布哈林，實際上一向祇是反對列寧的政綱，他並不攻擊托洛斯基。所以，列寧說布哈林派，「是最壞最有害的派別主義的代表」，這一派的「害處和搗亂，也最厲害」。結果呢？布哈林完全和托洛斯基聯合，並且加入了托洛斯基的一派；蘇聯共產黨第十次大會上，布哈林是投票贊成托洛斯基的主張的。

當時，因為國內戰爭完結，經濟建設的問題，就成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以為：為着達到經濟建設的目的，為着組織生產，改良生產，克服經濟的破壞狀態起見，應當趕緊把工會「國家化」起來，把工會變成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把工會溶化在經濟機關之中。這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很大的錯誤。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成

功以後，工會的性質，自然和資產階級或封建階級統治的國家裏不同。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工會，有自己的特性：這是極廣大的無黨的羣衆組織；列寧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學校」，這是學習聯合和團結，學習擁護自己的利益，學習經營和管理的學校」，（看列寧文集第十八卷上冊，第六十二頁）。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却完全不懂得這層道理。照列寧的意思：工會一方面積極的充分的參加生產的組織和提高，因此，和經濟機關發生親密的關係，別方面還應當去擁護工人羣衆的物質經濟的利益，反對蘇維埃機關中官僚主義的惡化。不但應當要求「工人做好的工作（這首先是經濟機關的任務），而且應當有人來擁護工人羣衆的日常利益，因為經濟機關——工廠管理局，礦山管理局等等——往往對於工人會做出錯誤的事情，或者太不注意而發生侵犯某些工人利益的情形，（這就首先是工會的任務）。布哈林和托洛斯基，恰好沒有看見這一方面的問題。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要取消工會，——有些老實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簡直這樣公開的說出來了。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辦法，是非常官僚主義的，他們不注意羣衆，不管羣衆的狀況。爲着要吸引極廣大的工人羣衆，來注意生產的問題，參加經營和管理的事業，必須經過工會，用宣傳的方法，用發展工人的階級意識的方法，來向他們解釋生產事業裏無產階級的任務。這一點是哈林林和托洛斯基所不懂的。照他們的意見，彷彿只要「從上面」實行，機關式的「混合生長」把「工會職員變成經濟機關的職員

」，加上上級機關的領導，加緊對於工人的「行政上的」調度，就可以改良生產。「他們這種意見是非常片面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不懂得：軍事共產主義已經結束了，用不着了，再只用「行政上的方法」去對付工人是不行了了。當時羣衆，因為戰爭和戰爭所引起的緊張狀態的緣故，已經非常疲倦，所以從前那種差不多軍事式的指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用不得了，從前那種主要只靠強迫和勉強的辦法，應當廢除，而要用新的方法，更民主的，更顧到羣衆日常生活的，更靠說服的方法。

對於工會問題的討論中，托洛斯基的重要錯誤，布哈林是同意的，並且他還傾向到工團主義方面去了。（工團主義者是贊成工業不要交給國家，而要交給職工會，例如某一工廠，應該交給那個工廠裏的工人，五金工業交給五金職工會，鐵路交給鐵路工會等等，工團主義者，否認黨的作用，認為政黨對於工人階級是用不着的）。在討論工會問題的時候，有一種觀點，接近於工團主義的，這種觀點，稱爲「工人反對派」；布爾塞維克的列甯主義者，也和這一派實行不調和的鬥爭。布哈林受了工團主義情緒的影響，說非黨組織的職工會，應該是經濟和工業的領導機關。布哈林事實上是主張工業機關中取消黨的領導作用。列甯很激烈的攻擊布哈林這種傾向。列甯說：「布哈林這樣說法，等於要分裂黨。正確點說，這種破裂，是工團主義派與黨之間的分裂。布哈林的錯誤，比托洛斯基的一切的錯誤，還要大幾倍」。

如果托洛斯基與布哈林的觀點，得到了勝利，這簡直使工人羣衆和我們的黨脫離，以至於職工會與黨之間的關係，弄到分裂。這種分裂，可以滅亡無產階級的專政。列寧屢次的與布哈林和托洛斯基鬥爭，他在討論中時常注意到托洛斯基，布哈林，斯列亞潑尼郭夫等等的組織行動，這種行動，可以使黨有分裂的危險。但是，黨內大多數始終是團結在列寧的周圍，列寧的觀點始終得到了勝利。

列寧在十次大會中，爲得要解決派別鬥爭的問題，曾經提出一個關於統一黨的決議，就是說，一切小組織都應該解散，否則，黨就要不客氣的立刻把有小組織性質的份子，開除出黨。這個決議在大會中通過了，這是一個反對一切小組織的決議，自然，也就是反對布哈林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攻擊了行會式的工團主義的傾向，尤其是「工人反對派」。我們已經看到列寧指出布哈林的工團主義傾向，因此，十次大會的決議所說的工團主義，行會主義的傾向和小組織行動，正是指着布哈林而說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在這樣嚴重的討論之中，列寧屢次的注意到布哈林的危險的立場。列寧對於布哈林的批評是：——布哈林似乎是理論家，似乎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是「虛偽的」「模糊的」「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很多的例子之中，譬如布哈林對於解決工會問題的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既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末他亦不能稱爲布爾塞維克的列寧主義者。

(八) 國家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國外貿易的壟斷等問題（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布哈林與列甯的分歧，有以下三個問題：（一）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二）無產階級的文化問題，（三）國外貿易壟斷問題。

照列甯的意見，在某種範圍以內，在某種條件之下，在蘇維埃國家中，可以有國家資本主義的。例如，企業的出租，和給與外國資本的租借。布哈林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已經是「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反對列甯和黨，他所了解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共和國的條件之下，是絕對不可能的，是沒有意義的。照他的意思，「國家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并存的，他認為只有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可以有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九二二年布哈林的觀點（參看俄國黨十一次大會前，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的文章）。當時，同意布哈林的，還有幾個別的同志。列甯已經注意到布哈林和其他的同情者的錯誤觀點。因此，他在大會上報告第一年新經濟政策教訓的時候，特別提出並且解說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列甯說：「這些同志，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明白，而只是『書生』式的瞭解，翻一翻舊書，只看見資本主義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任何書裏也沒有寫到共產主義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布哈林拘泥着經濟

學的庸俗觀念，很抽象的來瞭解這個問題，沒有把這個問題與歷史上的環境聯繫起來。

斯大林關於國家資本主義與新經濟政策聯繫的問題說：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列甯知道我們的工業落後，而農民需要商品，工人在工業很破壞的環境之下，不能夠使工業很快的發展起來，列甯認為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之下，許多可能之中，比較可能的，還是利用外國資本的幫助，來發展工業，經過這種辦法，建立蘇維埃政權與鄉村的聯繫。這樣的道路是無條件正確的，因為，我們在當時沒有別的可能，可以滿足農民，並且當時我們的工業，是破壞到極點，交通停頓，燃料又缺乏」。後來，大家都知道的，蘇聯的工業，雖然沒有得到外國資本的幫助，可是居然能夠獨立的恢復起來。這更加證明布哈林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布哈林不願實際政策上當時怎樣聯合無產階級和農民，而祇願談書本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蘇聯黨的十一次大會上，列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理由，是否說服了布哈林呢？一點也沒有。布哈林不但不接受列甯的正確觀點，甚至於經過了幾年，在九二五年（列甯死了以後）他在有一次會議上，說他自己在兩個問題上，仍舊和列甯不同意的：第一，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自他認為列甯在兩個問題上，是不正確的。

布哈林和列甯對於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亦有不同的意見。在一九二二年的秋季

和冬季，蘇聯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文化，有了很多的研究。在那時候，有一個「無產文化社」的機關，這個機關，現在還是有的，但是，從前是在卜克唐諾夫的影響之下的。卜克唐諾夫在一九〇九年就從布爾塞維克的黨裏排除出去了。卜克唐諾夫在無產階級文化問題上，從來沒有與黨同意過。「無產文化」派與卜克唐諾夫的錯誤，是什麼呢？就是——文化彷彿是離開全部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和運動的。不需要取得資產階級舊文化中可貴重的部分，而可以勉強的造出一種特別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列甯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問題，在一九二〇年就這樣寫：「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已經有世界歷史的意義。馬克思主義何以能夠得到這樣偉大的意義呢？——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但不拋棄資本主義時代可寶貴的一部分文化，而且是取得一切寶貴的東西，還要把這兩千多年人類思想及文化發展裏的寶貴東西，加以改造。祇有根據這種基礎，循着這種方向，繼續工作，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來貫通他，才是真正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當時列甯對於「無產文化派」，堅決的駁斥他們這種空想的不正確理論，實際上有害的一種企圖，就是想造成特別的限於自己組織內的文化等等。

「無產文化派」在卜克唐諾夫的影響之下，反對共產黨的影響，並且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文化運動與整個的無產階級運動對立起來，去造出自己的特別的文化，彷彿是最革

命的，其實不過是最狹義的行會主義式的「文化」。他們不估計到：工人階級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創造者（生產者），而且他們已經有了政權，來領導幾千萬的農民。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裏，列甯所改正過的中央的信上，說得很明白：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文化派「是以資產階級的哲學觀點，當做無產階的文化，拿來給與工人，使工人惡化」。當時布哈林不同意列甯的觀點，而同意「無產文化派」（上面已經說到過，布哈林是在卜克唐諾夫的思想的影響之下）。

一九二二年秋季，有一個領導「無產文化社」的普列特聶夫（卜克唐諾夫派的），他在真理報上做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充滿了卜克唐諾夫的精神。當時列甯極堅決的不同意這篇文章，但是列甯在這時候，已經病了，不能親自出來說話。因此，他委託耶郭夫立夫同志去回答這篇文章，並且他指出特別應該注意的幾點。列甯的意思是：就是不要一切智識份子式的空想和發明，如同卜克唐諾夫之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不要發展許多糊塗和有害的思想；對於這個問題，應該看一看羣衆的情形，就是「在我們這裏，有幾千萬無智識的，不能讀書不能寫字的，甚至於連卜克唐諾夫所輕視的這種資產階級文化的啓蒙程度都還沒有的人」。因此，取得資產階級文化中寶貴的東西，來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關於普利特聶夫同志和耶郭夫立夫同志的文章，布哈林顯然是站在卜克唐諾夫派方

面，與列甯進行「長期的鬥爭」（這是布哈林自己說的）。列甯很堅決的反對布哈林的卜克唐諾夫主義的觀點，當耶郭夫立夫同志執行列甯的委托，寫了一篇文章，駁斥普列特森夫的時候，布哈林就向列甯提出「哀的美敦」式的抗議（布哈林自己說的），要求取消文庫的幾段，尤其是和布哈林的觀點不相容的地方；自然這種不同意，帶有很深刻的性質。

在一九二二年底，布哈林與列寧，對於國外貿易壟斷問題，又有了分歧。國外貿易壟斷，能夠保證恢復蘇聯的工業。布哈林所提出的辦法，却是削弱國外貿易的壟斷，使工業發展，更加困難。列甯就很堅決的反對布哈林的觀點，並且指出這些觀點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是布哈林所提議的辦法，實在是有害於無產階級，而有利於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的成份。

（九）結論

同志們！你們讀了以上所述的一個短短的敘述，就可以知道，在列寧生前的時候，布哈林就已經是反對列甯主義的了。但是如果不起列甯在一九二二年底對於布哈林所下的最後一個批評，那末，這個敘述不會完全的。當然，列甯是知道布哈林對於理論問題是很有興趣的，而且在理論方面，是很有研究的，可是列甯很多次數的反對布

哈林，並且指出布哈林在解決各種問題的時候，不是完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他的理論也不是完全用馬克思主義的。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切實際的政策，是根據於理論的，科學的，如果這種根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那末在政策上，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也就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所須要的了。布哈林的很多的動搖和猶豫的來源，就是因為他的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因為布哈林同志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列甫對於布哈林，不是覺得沒有希望的，他以為布哈林在某個時候，都能夠完全貫通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實質，而完全站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但是，這種希望，沒有能夠達到，列甫對於布哈林同志，有了很多年的認識，列甫在一九二二年底，根據這種認識，做了一個結論，他不得已而指出：「布哈林的理論觀點，可以不可以把他算做完全的馬克思主義的呢？」——這是很可疑的」這就是列甫對於布哈林同志最後的結論。

是否列甫指摘了以後，布哈林能夠從新研究一下，而站到真正馬克思主義和真正列甫主義的觀點上去呢？很可惜！布哈林不肯學習列甫的指示，而且他所做的更壞些，居然站到右傾的觀點上去了。很明顯的跑到黨和列甫主義的敵對方面了去。他應該知道，列甫在黨內有怎樣偉大的威信，可是，他曲解列甫的學說，企圖把列甫主義來

適應右派的要求。、在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同志有一次演說，叫做「列寧的政治遺囑」，按照這篇演說，完全可以代表曲解列寧主義的觀點，說列寧曾經反對向富農作無情的鬥爭，好像列寧從來沒有說到集體農莊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道路，好像他也否認鄉村中的階級鬥爭等等。布哈林自己是右傾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他企圖把列寧亦變爲右傾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好像說：「你們說我們是右傾，是機會主義，但是你們所說的右傾，却是真正的列寧主義」。這都是托洛斯基加米爾夫和齊諾維夫的老調，他們也企圖把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反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觀點，當做「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布哈林同志也走了同樣的道路。但是這種曲解列寧主義，把列寧主義當作右傾招牌的企圖，已經被黨揭穿了。

列寧對於布哈林的批評真正不錯，他說布哈林同志「在政策上像小鬼般的動搖不定」。在整整十年之中，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起，一直到列寧死爲止，在任何一年，任何一個問題上，布哈林與列寧的意見總不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不同的意見裏面，——從理論的科學的問題起，一直到劇烈的派別性的鬥爭爲止，布哈林同志總是反對列寧主義的路線的。在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的時期中，或者在一九二一年討論職工會的時期中，布哈林好幾次拉了黨內一部分同志，到自己方面去，自然，在那時候黨內發生危機，——在黨內，布哈林的政策，或者可以「占到上風」，——每到這個時候，

列甫當立刻就警告全黨，指出布哈林的政策，是亡黨的政策，可以使無產階級專政滅亡的。如果在一九一八年黨內的鬥爭中，「左派共產主義」的首領布哈林，戰勝了列甫，而使黨按照他們所主張的戰爭道路去對德國宣戰，那末，無疑的可以使蘇維埃政府滅亡。如果討論職工會的時候，反對派的首領托洛斯基布哈林，在蘇維埃共和國極危險的時期中，戰勝了列甫，那末，誰都可以知道：這個危險，可以使黨與職工會分裂，就是黨與工人階級分裂，使蘇維埃政權，從此倒台。

黨很正確的反對「小鬼般動搖不定」的布哈林政策。黨應當在現在還要繼續與這種動搖的觀點，作堅決的鬥爭。

布哈林同志現在的動搖和猶豫的傾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布哈林以前的一切歷史。布哈林以前從左傾一方面好像極革命的，用無政府的工團主義，來反對黨和列甫；而現在呢？他從右的方面來反對黨。這種或左或右的傾向，一點却沒有什麼奇怪。只要本來是有傾向的人，他始終是要離開階級的立場：或者遇着了困難，公開的投降，妥洽，僥倖而右傾，或者用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絕望，膽小，掩蓋自己的沒有克服困難的能力，而「左傾」。至於在什麼時候右傾，什麼時候左傾，那末，要看具體的歷史環境和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來決定。譬如加米焉夫，齊諾維夫，在十月革命時候反對暴動，犯了右傾，而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犯了「左傾」。批評蘇聯的

黨，說黨革命得很不充分。加米爾夫與齊諾維夫，是從右傾機會主義跑到「左傾」；而布哈林却從「左傾」的機會主義跑到右傾。或者以革命的空談，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或者公開的說出來，這兩種情形在形式上看來，雖然是有差別，但是實質却是一樣：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根本的利益，拋棄無產階級的政策，他們所要實行的政策，不是有利於無產階級，而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

黨已經把托洛斯基主義打得粉碎，對於代表小資產階級情緒，代表資本主義成份，代表富農情緒和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亦要鬥爭到底。團結在列寧主義周圍的黨，用極堅決的革命政策，與右傾的機會主義對立起來，只這種無產階級的政策，才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工人階級要揭破，消滅右傾的或「左傾」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和猶豫，並且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富農，與基本的農民羣衆，建立極親密的關係，來克服我們面前的一切困難，然後才能夠執行我們歷史的使命：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的報紙上，登載了右派的首領布哈林湯姆斯基賴可夫三位同志的聲明書，他們在這個聲明書中，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負責與黨內一切傾向作鬥爭，首先要反對右傾和調和派。這個聲明書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後的幾天寫的；在全體會議上，右派的首領，還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因此全體會議，

把布哈林同志，開除出政治局，而給賴可夫和湯姆斯基同志一個警告。

他們承認自己錯誤，是仍舊留着自己的「餘地」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再來攻擊黨。當然，這種聲明書，無可爭論的表示中央委員會有了極大的勝利。但是，他們的聲明書，是否忠實？是否他們完全拋棄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完全跑到黨的路線上來？這却要到將來才可以證明。因為各種各樣的机会主義派別，曾經很多次數欺騙過黨，如托洛斯基和加米耶夫，齊諾維夫，亦曾經寫了很滑頭很外交式的聲明書，在實際上，他們還是繼續他們的觀點，屢次在寫了聲明書之後，又起來反對黨的路線。黨當然接受他們三人的聲明書，但是黨同時等他們在實際行動上，來證明他們自己同意黨的路線，擁護黨的政策，而與右傾作堅決的鬥爭。自然他們三人的聲明書，一刻都不能停止黨與一切右傾理論和行動，作劇烈的鬥爭。現在在蘇聯國內，還沒有掘斷資本主義的根子，現在還有富農，商人，小資產階級，一般的資本主義的成份，這種分子，能夠影響到我們黨內最落後的一部分，形成右傾和調和派的情緒和觀點。所以與右傾和調和派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之一。